

WORLD AGRICULTURE

(Monthly, Started in 1979)

No.10, 2021

Main Contents

- Total leve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y system in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Indonesia,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 *LIU Chao, XING Huaihao, ZHU Mande* (4)
- Foreign experience and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constructing the “green box” subsidy policy system
..... *WANG Ying, WEI Jiashuo, GAO Ming* (23)
- Evolution and trend of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 *CHEN Hui, QIE Hongkai, GAO Fang* (33)
- Promoting people’s livelihood through reform
—An analysis of the livelihood effects of policies in the pilot zon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 *Zhang Yaoyao, Chen Zhiguang* (41)
-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the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movement in Japan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rural society
..... *FENG Chuan* (62)
- RCEP, agricultural trade expans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 *Xia Wenhao, Zhang Yizhuo* (70)
-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ment of cotton growers
..... *Li Qinghai, Xu Wenyi* (81)
- Can large-scale breeding stabilize the fluctuation of hog price
..... *Liu Shuo, Guo Jun, Tao Jianping, et al* (93)

Edited by World Agriculture Editorial Office

E-mail: shijenongye2008@126.com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No.82-130

Published by China Agricultural Press Co., Ltd.

Adress: No.18 Building Maizidian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125

Editor in Chief: Hu Leming

Vice-Editors in Chief: Zhang Lisi Xu Hui

Executive Chief Editor: Jia Bin

Editors: Wei Jinjin Zhang Xuejiao Zhang Wenting

Tel: 010-59194435/988/990

Fax: 010-65005665

Website: <http://sjny.cbpt.cnki.net>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屈冬玉

副主任

隋鹏飞 陈邦勋 谢建民

张陆彪 马洪涛 倪洪兴

童玉娥 夏敬源 朱信凯

委员 (按姓名笔画排序)

丁声俊 才学鹏 万建民

马有祥 王广斌 王 钊

王林萍 孔祥智 邓秀新

左常升 平 瑛 叶兴庆

冯东昕 匡远配 朱 明

朱 晶 刘天金 刘汉武

刘国道 刘 艳 严端祥

杜志雄 李树超 李翠霞

杨万江 杨振海 杨敏丽

何秀荣 宋 昱 宋洪远

张广胜 张 弘 张兴旺

张安录 张林秀 张显良

张海森 张越杰 陈昭玖

陈剑平 陈 萍 陈盛伟

罗必良 周应恒 屈四喜

赵帮宏 赵鸭桥 胡乐鸣

姜长云 贺军伟 聂凤英

聂新鹏 栾敬东 高 强

郭 沛 唐 忠 黄伟忠

黄延信 崔利锋 彭剑良

韩沛新 程国强 程金根

蒲春玲 雷刘功 樊胜根

潘文博 潘利兵 霍学喜

目 次

热点聚焦

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支持体系：总体水平、结构演进及其经验启示

——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四国比较

..... 刘 超 邢怀浩 朱满德 (4)

新冠肺炎疫情下进口海鲜消费情况研究

..... 陈廷贵 仲艳秋 (14)

政策研究

构建“绿箱”补贴政策体系的国外经验与优化对策

..... 王 颖 魏佳朔 高 鸣 (23)

国内外地理标志保护管理体制的演变与趋势

..... 陈 晖 伽红凯 高 芳 (33)

分析预测

改革促民生：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民生效应分析

..... 张要要 陈志广 (41)

糖的消费干预手段：作用机制、实施效果与适用性探讨

——一个文献综述

..... 翟天昶 司 伟 王晶晶 (51)

环球瞭望

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推动机制与农村社会自主性

..... 冯 川 (62)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协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

RCEP 与农产品贸易拓展和效率提升 夏文豪 张溢卓 (70)

中国 农业

农民合作社对棉花种植户减贫增收的影响 李庆海 徐闻怡 (81)

规模化养殖能平缓生猪价格波动吗?

..... 刘 烁 郭 军 陶建平 等 (93)

国际 粮农 动态

广德福出席 FAO 新版《气候变化战略》首轮成员国磋商会等 4 则

..... (105)

贸易 监测

2021 年上半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形势分析及展望 马洪涛 (109)

2021 年 9 月世界农产品供需形势预测简报

..... 杨海成 马景源 (116)

其 他

合作促节粮 减损助安全

——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会议综述 焦 点 吴 薇 刘 博 (121)

英文 摘要

MAIN ABSTRACTS (127)

主 编 胡乐鸣
副 主 编 张丽四 徐 晖
执行主编 贾 彬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张雯婷
编 辑 吴洪钟 汪子涵
 陈 璠 程 燕
 林维潘

出版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 中农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出版日期 2021 年 10 月 10 日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 编 100125
电 话 (010)59194435/988/990
传 真 (010)65005665
投稿网址 <http://sjny.cbpt.cnki.net>

广告发布登记:
 京朝工商广登字 20190016 号

ISSN 1002 - 4433
 CN 11-1097/S

定 价 18.00 元

凡是同意被我刊发表的文章, 视为作者
 同意将其文章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
 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给第三方。
 特此声明

本刊所登作品受版权保护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摘编

● 热点聚焦

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支持体系：总体水平、结构演进及其经验启示

——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四国比较

◆ 刘超¹ 邢怀浩² 朱满德³

(1. 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 贵阳 550018; 2. 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阿拉尔 8433002; 3.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亚洲农业为何能持续快速增长，农业政策支持尤为重要。本文选取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为样本，运用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分析其经济发展进程中农业政策支持水平与结构演化等特征。分析表明：样本国家初步实现由剥夺农业向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转型，但越南仍在负保护与正支持间反复；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逐步提高，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已高出 OECD 平均水平，中国也开始接近 OECD 平均水平，但离农业高保护国家仍有差距；市场价格支持措施是主要支持方式，但国内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致使农业生产者支持震荡频繁；直接补贴结构较简单，以挂钩补贴措施为主，投入品补贴是主导方式，其中中国补贴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稳步增长，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农业知识和创新系统；单项农产品支持重点保护食糖、谷物和肉类，优势出口产品支持水平较低。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后发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支持政策；市场价格支持；直接补贴；一般服务支持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1.10.001

1 引言

过去几十年间，亚洲农业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主要农产品供给大幅增长，为全球缓解贫困和饥饿等做出了突出贡献。亚洲农业在全球农业生产体系和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其中稻谷、茶叶、棕榈油、天然橡胶等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亚洲农业为何能取得持续快速增长？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农业支持

政策的改革和转型等共同支撑了世界农业增长的新

收稿日期：2021-04-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收储制度改革、农户经营行为调整与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研究”（72063003）和“基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适应性的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研究”（71963005），贵州师范学院奖励补助资金项目（2021GZJ007）和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项目（2020JG10）。

作者简介：刘超（1980—），女，山东乳山人，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政策；邢怀浩（1994—），男，山东济南人，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政策。

通信作者：朱满德（1983—），男，安徽庐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政策、粮食经济等，E-mail:mdzhu@gzu.edu.cn。

亚洲奇迹。以中国为例,中国于 21 世纪初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农业政策实现由剥夺农业向支持保护农业的重大转型,政府通过持续加强农田水利、高标准农田及配套建设等的投资,加大农作物良种、化肥、机械等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和应用等的支持,推动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和农业经济高速增长,有效解决了十四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1]。2001—2021 年,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农业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保护下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在逐步解决食物自给的同时扩大了农产品出口,部分国家实现由农产品净进口向净出口的逆转性变化,2019 年,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农产品出口额均位居世界前十的行列^[2]。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非洲等后发国家如何有效推动农业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回溯农业政策演变和发展的进程,主要政策工具源起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初始目标是为了稳定或激励粮食等农业生产,此后演变为稳定农业收益和农民收入、提升农业竞争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多元目标^[3-4]。尽管学界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合规性和有效性仍有诸多争议,但实践中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已经成为多数国家农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可能造成激励错位和贸易扭曲,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张约束严重扭曲生产和贸易的国内支持措施,要求各成员不得超过其承诺水平。为了履行 WTO 农业协定,主要发达国家持续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并开展农业政策的结构性改革^[5-6]。如,美国^[7]、欧盟^[8-9]逐步减少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支持,缩小支持范围并降低支持水平,转而加大直接补贴措施力度;日本以稳定收入补贴替代其长期坚守的大米价格支持,在探索农业直接支付制度上迈出关键一步^[10-11]。

基于农业禀赋条件、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亚洲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巴西等新大陆国家不尽相同,在农业政策制定和改革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国别差异。较之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补贴为主导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实力,还是政策目标、实施条件和制度环境都有显著差异,发达国家

所倡导的政策措施面临适用性重大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业增长举世瞩目,并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经验”已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的榜样;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盟成员农业生产潜力巨大、进步明显,亦值得持续关注和系统研究。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新形势下,如何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进一步提升农业部门的竞争力、适应力和创新力,推动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探究其农业政策改革动态及其效果,不但有利于自身农业支持政策的改革和完善,而且对其他后发国家制定和调整农业政策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研究方法 with 对象

2.1 研究方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评估和监测其成员农业政策改革,开发了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用于评估所有农业政策措施的综合效应。由于农业政策日益增多、操作不断细化,政策影响日趋复杂,OECD 于 1999 年、2007 年和 2014 年多次调整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中的政策分类,并构建农业支持总量估计、生产者支持估计、一般服务支持估计、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等指标体系评估农业政策的多重影响^[12]。进入 21 世纪,OECD 陆续将金砖国家、部分东欧国家等非 OECD 成员纳入评估和监测范围,建立了涵盖 26 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政策评估数据库,包括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并对所有评估和监测对象的农业政策改革发布年度监测报告^[13]。为了便于国际比较和聚类研究,本文选用 OECD 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及其指标数据,以探究不同国家或者相似国家农业政策在变化趋势与结构演进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和一般经验。

2.2 研究对象的选择

OECD 将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哈萨克斯坦 8 个亚洲国家纳入农业政策评估和监测的范畴。其中,日本、韩国为经济发达的农业高保护国家,通常与美国、欧盟放置一起比较,称为“日韩模式”;哈萨克斯坦与东

亚、东南亚的农业生产结构差异较大，政策支持方式和重点呈现明显差距，因此探究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调整的共性特征可以选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实施类比。鉴于已有文献对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农业政策进行系统比较，同时考察经济发展进程中农业政策调整改革的过程性、不同发展水平下农业政策结构的差异性，以及中国农业增长的示范效应及经验的可推广性，本文选取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 4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同属东盟成员，受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等影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中国都较为类似。

第一，农业部门对样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关键支撑作用，且样本国家也都处于农业政策转型的关键时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 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4 135 美元、3 485 美元和 2 715 美元，均处于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农业增加值分别为 1 423 亿美元、333 亿美元和 366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7%、8.8% 和 14%，农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分别高达 28.6%、23.4% 和 37.4%，仍需要农业部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做出基础贡献；同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0 217 美元，属中高收入国家，农业增加值 10 20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1%，农业就业比例为 25.4%。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可以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有效的参照和比较。而且，现阶段越南正处于农业“负保护”向“正支持”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则处在由市场价格支持措施转向直接补贴措施的结构调整时期，考察转型时期农业支持水平波动和结构变化等特征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二，样本国家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日益活跃。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通过区域市场、双边贸易协定等推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农产品出口创汇功能突显，两国出口额分别由 2000 年的 49 亿美元、23 亿美元快速增加至 2019 年的 329 亿美元、186 亿美元，成为农业出口增长最具潜力的国家。中国是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2019 年农产品进口额为 1 370

亿美元，仅次于欧盟和美国；出口额 710 亿美元，次于欧盟、美国和巴西。中国与东盟成员的贸易互补性也为相关国家的农业发展方向和政策支持重点调整等提供有益参考。

第三，相似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农业政策取向的类似性和可参照性。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 0.09 公顷，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也分别只有 0.10 公顷、0.05 公顷和 0.07 公顷，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0.18 公顷。为提高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产出效益，各国农业政策均侧重于激励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并以此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或扩大农产品出口。虽然样本国家在农业经营效率、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但农业政策改革调整具有“亚洲路径”的一般特征，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这些即是本文的价值或边际贡献所在。

3 农业政策支持水平及其扭曲效应

3.1 农业支持总量水平

农业支持总量衡量的是所有农业支持保护措施形成的由农产品消费者和全体纳税人转移到农业部门的货币支持量，中国与菲律宾的农业支持总量在持续增加后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4 年出现增长的“拐点”，印度尼西亚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越南进入下降通道。从表 1 可知，中国 1995—1997 年（三年平均，下同）的农业支持总量仅 118 亿美元，2004 年全面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阶段，此后由 2003—2005 年的 423 亿美元快速增长至 2014—2016 年的 2 544 亿美元，2017—2019 年减少至 2 276 亿美元，仍保持在高位水平；菲律宾的农业支持总量从 2000—2002 年的 24 亿美元增加至 2013—2015 年的 100 亿美元，2017—2019 年减少至 93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农业支持总量从 1995—1997 年的 12 亿美元迅速增加至 2017—2019 年 338 亿美元，其中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与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曾短暂跌为负值。越南受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起伏影响，农业支持总量波动频繁、波动幅度较大，由 2008 年—65 亿美元骤然反弹至 2009 年 37 亿美元，此后持续走低，2015 年起再度转为负值，2017—2019 年为—21 亿美元。

表 1 样本国家农业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及其变化

	中国		越南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OECD	
	1995—1997 年	2017—2019 年	2000—2002 年	2017—2019 年	2000—2002 年	2017—2019 年	1995—1997 年	2017—2019 年	1995—1997 年	2017—2019 年
农业生产者支持 (亿美元)	60	1 915	5	-27	22	76	7	299	2 390	2 311
# 市场价格支持 (亿美元)	16	1 260	3	-31	21	73	4	271	1 565	961
# 直接补贴 (亿美元)	45	655	1	4	1	3	3	28	825	1 350
生产者支持估计百分比 (%)	2.6	13.3	5.6	-7.0	22.1	27.3	1.9	24.2	28.0	17.6
农业一般服务支持 (亿美元)	55	361	2	6	2	16	5	19	441	428
农业支持总量 (亿美元)	118	2 276	7	-21	24	93	12	338	3 085	3 188
# 消费者转移	23	1 507	6	9	25	82	11	244	1 811	1 181
# 纳税人转移	107	951	1	-14	1	17	1	100	1 555	2 265
# 财政收益	-12	-182	-0.2	-16	-2	-6	-0.1	-5	-280	-257
农业支持率 (%)	1.5	1.7	2.1	-0.8	3.0	2.9	0.5	3.2	1.2	0.6
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	1.03	1.15	1.07	0.94	1.28	1.38	1.02	1.32	1.39	1.21

注：根据 OECD 最新数据库，越南、菲律宾数据区间为 2000—2019 年，中国、印度尼西亚为 1995—2019 年。

数据来源：根据 OECD PSE/CSE Database (2020) 整理。

需要甄别的是，中国农业支持总量规模因高于其他国家而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与中国庞大的农业总产值相比，其支持保护程度总体是偏低的。2017—2019 年，中国农业支持总量仅占农业总产值的 16.5%，虽然高于农产品出口国加拿大 (11.7%)、澳大利亚 (5.3%)、巴西 (3.8%)，但显著低于农业高保护国家挪威 (95.6%)、冰岛 (82.0%)、瑞士 (75.9%)、韩国 (59%) 和日本 (56.2%)，也低于美国 (26.4%) 和欧盟 (25.5%)^[14]。同期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一比例亦达到了 28.0%、33.4%，与 OECD 平均水平 (27.1%) 接近，也高于中国。

考察农业支持率（即农业支持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变化，发展中国家受制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补贴农业部门仍然面临巨大压力。其中，中国、菲律宾农业支持率在 1.5%~3.0% 波动，2017—2019 年分别为 1.7% 和 2.9%；印度尼西亚保持上升趋势，由 1995—1997 年 0.5% 升至 2017—2019 年 3.2%，显著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及 OECD 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其国内生产总值偏低。越南农业支持率波动明显，总体呈下行态势，由 2000—2002 年 2.1% 降至 2017—2019 年 -0.8%。

3.2 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

农业生产者支持测度的是所有农业支持措施形成的由农产品消费者和全体纳税人转移给农业生产者的补贴总额。2015 年至今，中国与菲律宾的农业

生产者支持进入“阶段性”的减降通道，印度尼西亚波动上升，但三个国家总体都有显著增长，越南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这与四国农业支持总量的变化趋势一致。其中，中国农业生产者支持增长尤为显著，从 1995—1997 年 60 亿美元快速增加至 2017—2019 年 1 915 亿美元，菲律宾从 2000—2002 年 22 亿美元增加至 2017—2019 年 76 亿美元，两国的农业生产者支持自 2015 年以来都有小幅下滑。印度尼西亚在 1997—1999 年、2008 年由于国内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市场价格支持水平整体为负，致使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大幅波动，但总体上仍由 1995—1997 年 7 亿美元增加至 2017—2019 年 299 亿美元，增长较为显著。越南农业生产者支持亦受国内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影响，其间多次出现负值，从 2009 年 31 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减少至 2019 年的 -37 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者支持频繁大幅波动，主要在于大多数倚重关税等边境保护和国内价格干预政策等市场价格支持措施^[15]。农产品国内国际价格波动频繁，造成市场价格支持水平显著震荡，进而波及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例如，2008 年全球粮食危机引发国际粮价快速上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调控国内粮食供需以稳定国内粮价，部分粮食品种的市场价格支持水平大幅降低，甚至出现较大负值（即国内粮价低于国际市场的情景）；2009 年国

际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其市场价格支持水平迅速逆转为正值且大幅增长。反之，大部分发达国家收缩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范围，或者将市场支持价格降至较低水平，转而对农业生产者采取直接补贴，由于财政预算安排的计划性，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波动幅度和频率都较小。

生产者支持估计百分比（以下简称“农业补贴率”）是农业生产者支持占农场总收入的比率，反映农户经营收入中来自农业政策作用的份额。中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农业补贴率不断提高。其中，中国从 1995—1997 年 2.6% 增长至 2017—2019 年 13.3%；印度尼西亚从 1.9% 快速增长至

24.2%；菲律宾经历短暂下滑后，2017—2019 年逐年增长至 27.3%；这种增长也是发展中国家由剥夺农业转向支持保护农业后的共性特征。不同的是越南，从 2000—2002 年的 5.6% 波动下降至 2017—2019 年的 -7%（图 1）。从补贴水平看，中国 2012 年以来保持在 14% 左右，意味着农户经营收入的约 14% 来自农业政策的转移作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农业支持保护程度已进入中等偏上的国家行列，其农业补贴率在 2012 年后已超过 OECD 平均水平，仅次于挪威、冰岛、瑞士、韩国、日本等农业高保护国家；而越南在 2014 年后再度进入农业负保护阶段（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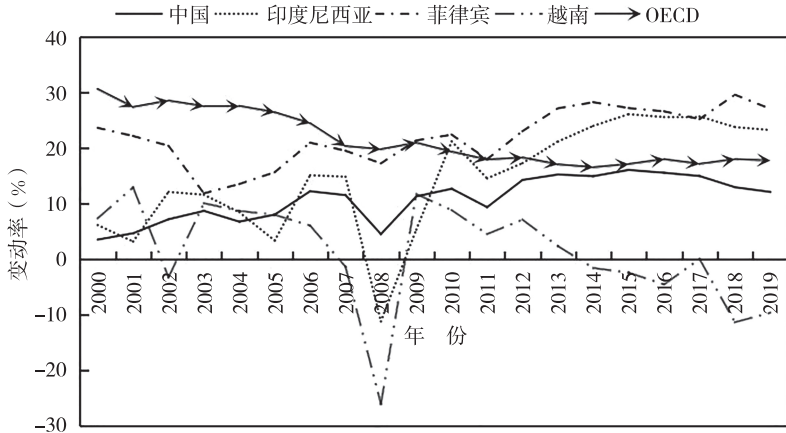


图 1 样本国家农业补贴率变动（2000—2019 年）

数据来源：根据 OECD PSE/CSE Database（2020）整理。图 2 至图 3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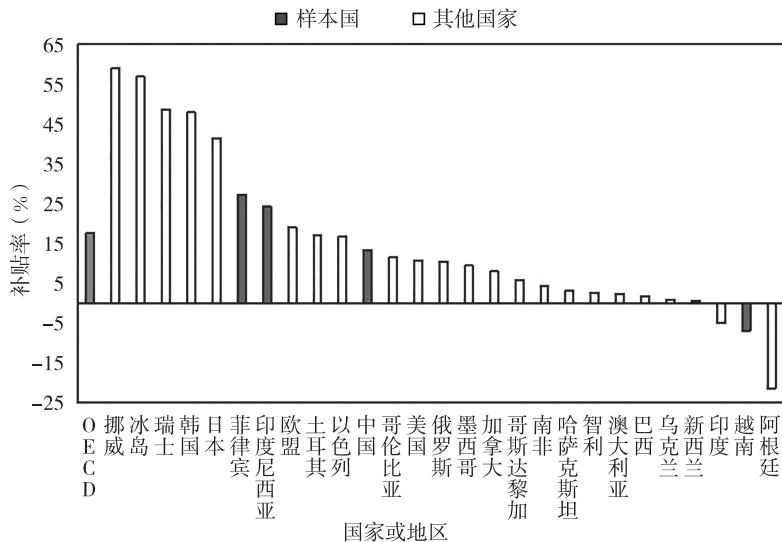


图 2 2017—2019 年主要国家或地区农业补贴率

3.3 农业一般服务支持水平

一般服务支持水平反映的是政府财政对整个农业部门的支持和投入水平,在过去 20 多年里,样本国家一般服务支持均以增长态势为主,但近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开始进入减降通道。其中,中国由 1995—1997 年 55 亿美元增加至 2015—2017 年 404 亿美元,2017—2019 年减少至 361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由 1995—1997 年 5 亿美元稳步增加至 2012—2014 年 34 亿美元,2017—2019 年逐步减少至 19 亿美元;菲律宾由 2000—2002 年 2 亿美元增加至 2017—2019 年 16 亿美元;同期越南由 2 亿美元增至 6 亿美元。尽管样本国家开始重视对农业部门的综合性支持,如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并逐步增加资金投入,但受经济水平和财政实力等束缚,支持力度均有待加强;其一般服务支持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长期在 5% 以下,与日本、韩国尚有较大差距,其中日本这一比例常年保持在 10% 以上,最高达 22%,韩国多个年份也在 10% 以上^[14]。

3.4 农业政策的市场扭曲效应

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名义保护系数等指标均反映实施农业政策引起的市场扭曲效应。数据显示,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农业政策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有所增强(发达国家在由负保护向正支持转变阶段普遍如此,但伴随着政策支持方式的转型对农业干预扭曲呈现下降趋势)。以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为例,中国由 1995—1997 年 1.03 提高到 2017—2019 年 1.15,同期印度尼西亚由 1.02 增至 1.32,菲律宾从 2000—2002 年 1.28 增至 2017—2019 年 1.38;越南对农业市场的扭曲程度较弱,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在 0.8~1.2 频繁波动,2017—2019 年为 0.94。比较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农业支持保护引起的市场扭曲程度可知,中国不仅低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低于 OECD 平均水平,在所有评估监测对象中均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

4 农业支持的政策结构和产品特征

4.1 农业支持总量结构

农业支持总量分为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补贴和对农业部门的支持补贴,样本国家都是以农业生产

者支持为主,因而对农业生产者经营决策和生产行为的影响不断强化。如,中国农业生产者支持占农业支持总量的比重由 1995—1997 年 51.1% 增长至 2017—2019 年 84.1%;菲律宾观测期内平均值达 86.2%;印度尼西亚大多保持在 80% 以上(生产者支持为负值年份除外),2017—2019 年达 88.5%;越南虽然波动剧烈,但在农业生产者支持为正值的年份,所占比重也在 70% 以上。

从政策成本分担看,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农业政策成本主要由农产品消费者承担,而中国由农产品消费者和纳税人共同担负。长期以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农产品消费者转移占农业支持总量比重基本在 80% 以上,这与日本、韩国类似,而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主要由纳税人承担^[16]。中国在 2000 年以前,国内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农产品消费者间接获得来自农业生产者的补贴,纳税人通过农业一般服务支持承担了支持农业部门的政策成本;伴随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产品消费者开始为农业支持政策“买单”,2017—2019 年来自农产品消费者的补贴比重升至 66.2%,实现了由纳税人承担向农产品消费者和纳税人共同承担的转变。

4.2 农业生产者支持结构

样本国家的农业生产者支持结构如图 3 所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农业生产者支持结构异常简单,这也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共性特征。其一,基本以对农产品施以市场价格支持措施为主,其占农业生产者支持的比重大多在 80% 以上。其二,直接补贴都是以投入品补贴为主,只有少数与种养数量挂钩的补贴类型。如,菲律宾对良种和肥料分销,干燥、仓储等农业设施装备,农业信贷和保险等进行补贴支持。越南主要是免除农业灌溉费、补贴高质量动植物种苗和农业机械;为使水稻种植面积保持在 400 万公顷以上,越南 2011 年实施与种养数量挂钩的水稻支持计划,按种植面积给予农民每年 2 亿~2.5 亿美元的直接补贴^[17]。印度尼西亚投入品补贴包括对农用肥料和种子,收获加工设施、农田灌溉和田间道路配套,病虫害防控和农业推广等补贴,以及涉农信贷利率优惠、支持地处农村的农业企业发展等;与种养数量挂钩的补贴只有对农业灾害的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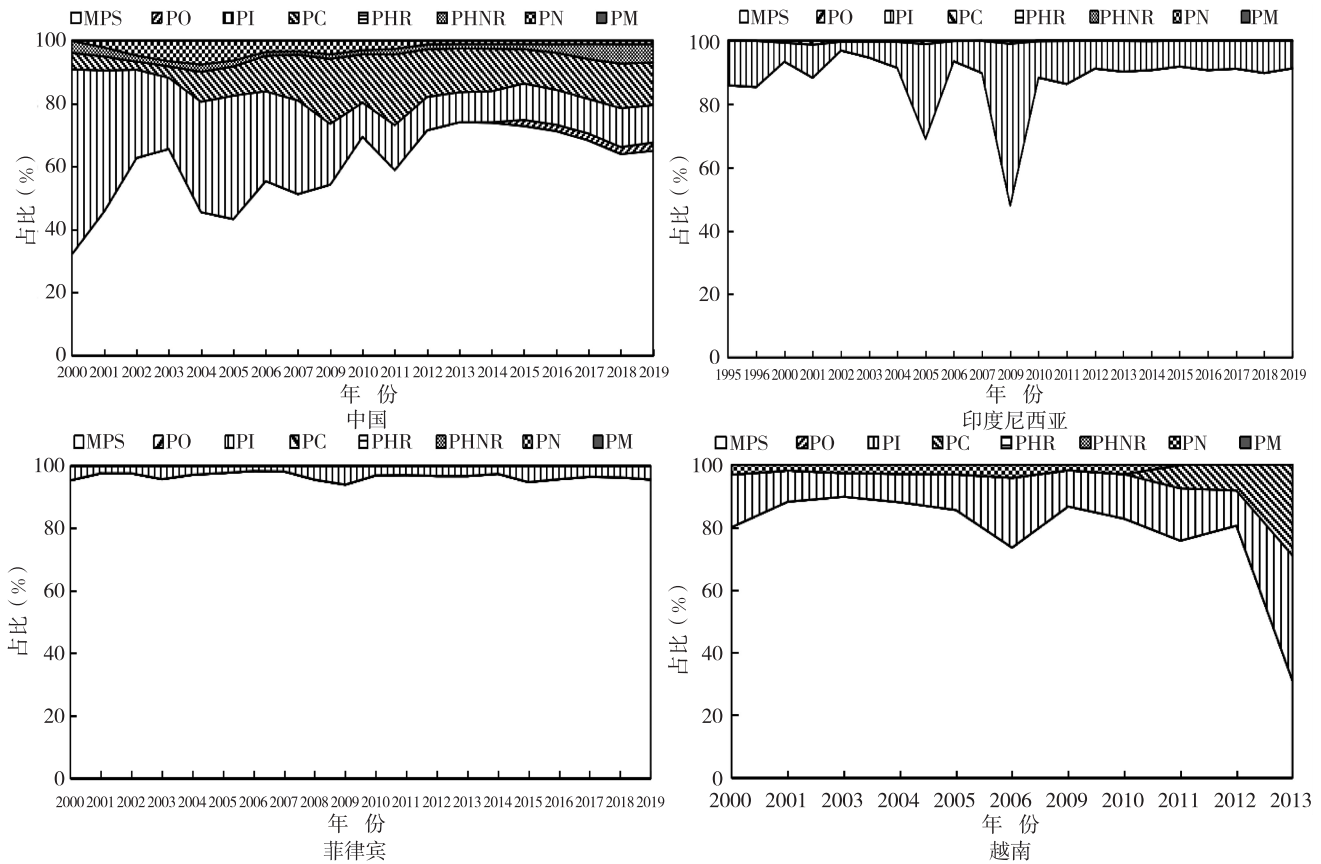


图3 样本国家的农业生产者支持结构

注：①中国在1996—1999年和2008年，越南在2002年、2007—2008年和2014—2019年，印度尼西亚在1997—1999年和2008年，其市场价格支持为负值，导致生产者支持结构异常波动，故做剔除处理。②MPS指市场价格支持；PO指基于产量的补贴；PI指基于投入品使用的补贴；PC指与产量挂钩的、基于现期A/An/R/I的补贴；PHR指与产量挂钩的、基于非现期A/An/R/I的补贴；PHNR指与产量不挂钩的、基于非现期A/An/R/I的补贴；PN指基于非商品标准的补贴；PM指混合支付。③A/An/R/I分别表示种植面积/牲畜数量/经营收益/所得收入。

其潜在含义在于：①发展中国家偏向于操作简单、效果直接的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将政策支持成本转嫁给农产品消费者，虽然社会福利损失较为严重，但可以避免财政负担的加重。②偏向使用投入品补贴，重点补贴种苗、农机具、肥料、灌溉等生产资料，以此激励农业生产发展。③其他类型的挂钩补贴则受政策目标、实施条件和配套制度等限制而较少使用，脱钩补贴亦受财力制约极少使用。

比较而言，中国的农业生产者支持类型日趋多样化。2000—2009年，对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支持占农业生产者支持的50%左右。此后国际农产品价格下滑并保持低位运行，而中国国内粮油和畜产品价格不断攀升，至2017—2019年市场价格支持所占比例增加到72.7%。就直接补贴而言，伴随挂钩补贴类型增多、补贴资金快速增长。2007年以前，挂钩

补贴主要是补贴投入品，如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2007年以来，与种植面积挂钩的补贴项目增多，粮食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大幅增长，目前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大豆和玉米生产者补贴等约占到挂钩补贴的60%。综合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农业支持方式和政策工具的多样化是普遍趋势。

4.3 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结构

样本国家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结构分析显示：

第一，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等予以支持是样本国家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的重点，并有效支撑了农业农村持续快速发展。其中，越南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支出占农业一般服务支持比例长期保持在75%以上，近年略有下滑；印度尼西亚在

多数年份保持在75%以上,其中2000—2016年仅有2年低于80%,2017—2019年占比76.4%;印度尼西亚在1995—2011年有12年保持在70%以上,2011年以来降至50%以下(2018年例外);菲律宾长期在50%~70%波动,2017—2019年为63.4%,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对农业发展作用显著。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投入的资金额度较大,其占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的比例在20%~40%,低于日本和韩国。日本和韩国优先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做法及其成效为大部分亚洲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农业基础设施成为大部分亚洲国家农业政策转型时优先支持的领域。中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投资的极度重要性。

第二,亚洲新兴国家较为重视对农业知识与创新系统的支持和投资,特别是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体系。中国在2010年之前,农业知识与创新系统方面的支持占一般服务支持的比例在10%左右,2010年首次突破20%,此后稳定在20%~30%,主要集中在农业教育与农民培训、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这对提升普通农户的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至关重要。印度尼西亚该比例有所波动,1998—2000年均达36.6%,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10%以下,2017—2019年仅4.8%;菲律宾该比例长期稳定在15%~25%(仅2000年和2010年例外,分别为26.5%和13.6%),越南则稳定在9%~16%。

第三,对公共储备进行补贴是样本国家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安全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为此中国先后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导致农产品公共储备支出大幅增长;在推进最低收购价政策和收储制度改革后,2016年以来收储规模有所减小,公共储备支出从高位回落,2017—2019年为177亿美元,占比49%。印度尼西亚为保障食物安全于2004年建立公共储备体系,其公共储备支出即成为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达60%以上(2016年),2012—2019年有7年超过了45%;越南自2000年以来农产品公共储备支出明显增加,尽管支持额度不大,但所占比重有明显增加;菲律宾这一比例则略有下降,这与美国、巴西等农产品出口国存在较大差异。而韩国、欧盟早期因实施价格干预措施导致公共储备费用大幅增长,由此

带来较为沉重的财政包袱,这一教训需引起重视。

4.4 农产品结构特征

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将农业生产者支持分为对单项农产品的支持、对某一产品组(如谷物类、油料类、畜产品类)的支持、对所有农产品的支持和对生产者的其他支持,并分别进行测度。数据显示,样本国家都是以单项农产品支持为主。其中,菲律宾对单项农产品的支持占农业生产者支持的比重长期保持在95%以上;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大多保持在90%和80%以上;中国这一比例稳步增长,2017—2019年为70%,表明农业支持措施的针对性和指向性逐步增强。从单项农产品补贴率考察,印度尼西亚由2000—2002年6.7%大幅增长到2017—2019年22.6%,同期中国由2.7%增长至9.8%;菲律宾总体平稳,经历小幅下滑后恢复性上涨,2017—2019年为26.8%;越南在正支持和负保护之间不断变化,最高为2001年11.6%,最低为2008年-27.4%,2012年以来连续下滑,2019年为-10.5%。

样本国家支持保护的农产品各有侧重,一定程度考虑了本国的国情农情。2017—2019年印度尼西亚对食糖(65.8%)的补贴率最高,即食糖生产者经营收入的65.8%来自农业政策的作用;对可可豆(53.6%)、玉米(42.5%)、大米(37.1%)、禽肉(32.0%)的补贴率都超出30%;对棕榈油、牛奶仍是负保护。同期,菲律宾补贴率最高的是大米(61.6%),剩余依次是食糖(49.4%)、禽肉(23.6%)、猪肉(22.4%)、牛肉(9.1%)和玉米(8.1%)。越南对玉米(41.9%)、食糖(37.6%)、鸡蛋(20.8%)和牛肉(9.7%)是正保护;而对猪肉(-4.4%)、大米(-7.1%)、禽肉(-40.5%)、橡胶(-53.8%)等是负保护。中国涉及的主要是粮油产品和畜产品,2017—2019年保护率较高的有食糖(51.6%)、棉花(46.8%)和油菜籽(44.9%),牛奶(32.6%)、小麦(25.1%)、玉米(20.2%)等次之,畜产品补贴率在10%~15%。由此可见,中国对牛肉、羊肉、禽肉等农产品的国内支持力度不大,主要是边境保护措施形成的国内外价差;大米、小麦、玉米、棉花等归因于国内补贴政策、市场价格支持措施和边境保护措施的共同作用。2014年中国试点棉花和大豆目标价格制度改革,2015年油菜籽、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相继改

革,以及近年逐步降低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使国内外价格逐步接轨,上述产品的单项产品补贴率伴随政策改革而有所降低。

样本国家单项农产品支持的共同之处在于:

①食糖是四国的重点保护产品,且保护程度较高。②谷物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支持对象。如中国对大米、小麦和玉米进行支持和保护,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大米、玉米,越南则是玉米。③四国都有选择性地对部分肉类产品进行支持,如菲律宾对禽肉和猪肉、印度尼西亚对禽肉、越南对牛肉、中国对猪肉等予以保护。④印度尼西亚对棕榈油、越南对大米和橡胶这类优势出口产品的支持力度较低,或是负支持,如此类产品更具出口竞争优势。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主要结论

考虑过去几十年亚洲农业增长绩效显著及其可能的复制价值,应用 OECD 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对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 4 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支持政策改革调整过程的支持水平和结构特征进行比较,探究经济发展进程中改革的经验启示与可能借鉴,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4 个样本国家农业支持总量水平较 20 世纪 90 年代均有显著提升,初步实现由农业剥夺向支持保护的政策转型。但受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支持方式等影响,越南仍然在农业负保护与正支持之间反复。样本国家农业支持措施侧重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现阶段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都是农产品消费者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成本,中国开始由农产品消费者和全体纳税人共同分担政策成本。采用农业支持总量与农业总产值比率来测度,样本国家总体支持强度虽然低于日本、韩国、挪威等农业高保护国家,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已经接近 OECD 平均水平。

第二,样本国家农业生产者支持与农业支持总量的变化趋势相同,但波动频率更高、波动幅度更大。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农业补贴率持续上升,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 OECD 监测对象中已经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水平,中国也开始接近 OECD 平均水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农业生产者支持结构异常简单,侧重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支持措施,并以直接补贴为补充;直接补贴措施以投入品补贴为主

导,只有少数与种养数量挂钩的补贴类型;过于倚重国内市场价格支持措施和边境保护措施是其农业生产者支持频繁波动的重要诱因。伴随经济发展,中国农业生产者支持的政策类型则日趋多样化。

第三,样本国家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稳步增长,重点集中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农业知识与创新系统,这对推动农业持续稳定增长起到关键支撑作用。对公共储备进行补贴是中国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食糖、谷物和肉类是样本国家重点保护的农产品,而对优势出口产品支持力度较低或采取负保护,这样更加有利于出口。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中国农业政策优先考虑的方面,中国对粮油产品和畜产品进行支持保护,伴随粮食最低收购价调整和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改革,粮棉油和畜产品的单项产品补贴率将有所降低。

5.2 政策启示

第一,综合考虑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政策实施条件等,需因地制宜选择支持补贴政策工具。尽管市场价格支持措施存在诸多弊端,却备受发展中国家青睐,并作为支持保护农业的主要手段,尤其是支持敏感农产品、短缺农产品的优先选项。一是政策操作简便,适度的支持价格对农业生产的激励效果直接,有助于缓解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棘手的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14]。二是由农产品消费者买单,不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包袱。三是尽管市场价格支持措施属于 WTO“黄箱”政策,但大部分发展中成员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因此不受 WTO《农业协定》补贴规则约束。但是,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进而引起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容易引致农产品过剩和农业结构失衡,导致过高的社会福利损失和经济生态代价,削弱农业竞争力。因此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纷纷缩减市场价格支持范围、降低支持价格水平,逐步转向针对农民收入或农产品生产的直接补贴措施。今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政策的制定、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应注意并协调好政策目标调整、实施条件约束和政策发展趋向等关系,注意及时调整政策工具。

第二,农业一般服务支持是整体性支持农业部门的重要方式,亦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建设的投资支持,

改善农田水利生产条件;着力加强对农业知识和创新系统的支持补贴,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对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但农业基础设施和田间工程建设、农业公共服务改善和能力提升等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必须加大政府的投资支持力度,这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所急需解决的。

第三,应根据各国国情农情,有选择地支持和保护重点敏感农产品。对净进口农产品或事关食品安全的敏感性农产品,应给予适度支持和保护,提高战略储备效能;对优势出口农产品,则不予支持或给予较低的支持,否则变成补贴国外消费者。

第四,对中国的农业支持保护应在推进政策改革和调整的同时,加强对国际社会的解释,争取得到重新认识。中国农业支持总量、农业生产者支持和一般服务支持的绝对量规模庞大,但如果与更加庞大的农业总产值相比,中国农业支持强度则明显低于美国、OECD平均水平,显著低于日本、韩国等农业高保护国家;即便是农业补贴率也低于OECD平均水平,低于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菲律宾等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冰岛等高保护国家。尽管中国地均补贴强度开始接近发达国家^[18],但考虑中国14亿多人口、农业经营有2亿多农户的现实,平均到每个人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补贴强度仍显著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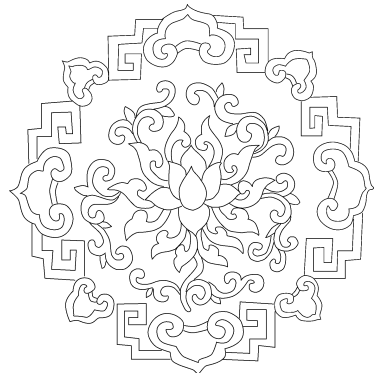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1] 胡冰川. 改革开放四十年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脉络与发展 [J]. 江淮论坛, 2019 (2): 29-36.
- [2] WTO.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20 [M]. Switzerl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1.
- [3] 程国强. 中国农业补贴: 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 [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
- [4] OECD. 中国农业政策回顾与评价 [M]. 李先德, 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 [5] 刘福江, 孙立新, 毛世平. 农业支持政策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分析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2): 34-41.
- [6] 朱满德.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补贴政策调整: 国际经验与启示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0 (2): 23-32.
- [7] 徐轶博. 美国农业支持政策: 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 [J].

世界农业, 2017 (8): 111-117.

- [8] 崔海霞, 宗义湘, 赵帮宏. 欧盟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演进分析: 基于 OECD 农业政策评估系统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5): 130-142.
- [9] 于晓华, 武宗励, 周洁红. 欧盟农业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粮食价格长期波动和国内农业补贴政策的关系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 (2): 84-96.
- [10] 邱楠, 曾福生. 日本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J]. 世界农业, 2018 (9): 190-196.
- [11] 叶兴庆. 日本大米支持政策的改革动向及启示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12): 93-98.
- [12] OECD. OECD's producer support estimate and relates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concepts, calculations, interpretation and use (the PSE Manual) [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6.
- [13] OECD. agricultural polic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2020 [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0.
- [14] 刘超, 刘蓉, 朱满德. 高保护经济体农业支持政策调整动态及其涵义: 基于欧盟、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冰岛的考察 [J]. 世界农业, 2020 (4): 13-22+30.
- [15] 朱满德, 邓丽群, 袁祥州. 价格支持抑或直接补贴: 中等收入经济体农业政策改革趋向: 对墨西哥、土耳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的考察与比较 [J]. 世界农业, 2019 (12): 10-20.
- [16] 朱满德, 邓喻方. 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调整动向及其启示: 基于美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四国比较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 40 (5): 764-773.
- [17] 袁祥州, 徐媛媛, NGUYEN CONG BINH. 越南农业支持政策效应分析 [J]. 亚太经济, 2016 (2): 75-79.
- [18] 黄季焜, 王晓兵, 智华勇, 等.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 (1): 4-12.

(责任编辑 张雯婷 卫晋津)



新冠肺炎疫情下进口海鲜 消费情况研究

◆ 陈廷贵 仲艳秋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在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上检测出新冠病毒后,进口水产品销售大幅度下降。本文以网络问卷形式收集 779 份消费者问卷,基于感知收益-感知风险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新冠肺炎疫情下感知收益、感知风险、知识、信任和总体态度对进口海鲜消费的影响路径进行组态研究。结果表明:①消费者对进口水产品的购买意愿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研究发现有 3 条路径可促使强消费意愿,可分类为感知风险主导型和感知收益主导型,后者可细分为政府依赖型和企业忠诚型。②弱消费意愿驱动机制有 3 条路径,且与强消费意愿存在非对称性关系。③组态间比较发现,总体态度在所有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其是否存在为决定消费意愿强弱的关键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建议对于探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食物消费意愿的影响路径及对策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进口水产品;感知收益;感知风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1.10.002

在保障全球营养和粮食安全方面,水产品作为与畜禽肉类、蛋类并列的三大动物性食物之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从温饱型向营养健康型转变,水产品在人们膳食结构中的比例日渐上升^[2-3]。《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9—2028)》预计,中国水产品消费量将年均增长 1.5%。自“十三五”规划以来,渔业生产“转方式调结构”,近年国内水产品总产量增长率已不足 1%^[3]。受渔业资源衰退、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资源、土地资源短缺等因素制约,国内水产品供给结构难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消费潜能释放到国际市场,出现了国内消费者“热买”全球优质水产品的现象^[4]。进口水产品对于调剂国内余缺、养护渔业资源、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6—2020 年总体上中国水产品进口数量与金额逐年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2020 年上半年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中国水产品进口数量仍然有所上涨,但在 2020 年 6 月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上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后,水产品进口数量快速大幅度下降,8 月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超 40%,其后虽然出现波动回升,12 月仍比 2019 年同期下降近 35%。进口水产品消费市场持续

收稿日期:2021-05-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173078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2019BGL011)。

作者简介:陈廷贵(1971—),男,重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资源经济与政策、食品经济,E-mail:tgchen@shou.edu.cn。

通信作者:仲艳秋(1996—),女,江苏宿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渔业经济与消费,E-mail:18251851628@163.com。

低迷, 优质水产品供需缺口加大, 加剧国内资源环境压力。进口水产品数量骤减的原因: 一方面是在于供给端, 中国海关加强监测, 阻断进口, 保障国内水产品市场安全; 另一方面在于消费端, 消费者因疫情影响提高了对进口水产品的感知风险, 从而降低其消费意愿。本文从消费者视角出发, 研究其进口水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路径, 探讨提升消费者信心和刺激进口水产品市场恢复的形成机制, 对于维护进口水产品供应链安全、降低国内渔业资源约束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 但是在进口冷链食品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下, 关于进口水产品的消费意愿研究尚未发现。从研究方法上看, 现有研究主要从回归分析^[6]、结构方程模型^[7]、实验研究法^[8]等计量方法对购买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多检验单一要素的边际净效应, 而忽视多个因素的联合作用结果。虽然不同因素对购买意愿影响均有其“净效应”, 但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也可能产生互补或替代作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进口水产品的购买意愿高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通过传统的回归分析探索单因素的净效应难以有效解释这种因果复杂性问题^[9]。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能够解释影响进口水产品购买意愿的多因素联合作用的问题。

基于此, 本文运用 fsQCA 方法, 构建感知收益-感知风险分析框架, 挖掘购买意愿背后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 探索强消费意愿的实现路径。本文的学术贡献和特色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组态视角将 fsQCA 方法引入消费者购买意愿研究领域, 丰富和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二是以新冠肺炎疫情对进口水产品消费的影响为例, 探讨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对食物消费的影响路径和对策, 为其他具体情境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路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框架

感知收益-感知风险模型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主流框架^[10-11]。消费者决策行为由感知收益与感知风险共同决定, 而感知收益与感知风险的过程是由诸

如知识、信任、总体态度等几个因素给定的因果解释^[12]。基于理性行为理论,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本文选取感知收益、感知风险、知识、信任和总体态度作为影响进口水产品消费意愿的条件变量, 探索其对消费意愿这一结果变量的联动效应, 揭示不同条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

1.1 感知收益

感知收益是消费者对某种产品或服务为自身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价值和利益, 是消费者想要获得的价值体现^[11]。Zeithaml 指出感知价值是消费者对感知收益与感知产品成本的权衡以及对产品效用的整体评价^[13]。感知收益在预测消费者购买决策上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 它能够很好地解释消费者在特定情境中的偏好和购买行为。进口水产品会给消费者带来营养价值、口感、品牌甚至是安全性上的益处, 如果其产品收益让消费者产生“值”的想法, 会改变消费者购买决策。党伊玮和宋灏岩在研究消费者购买东帝汶进口水产品影响因素时发现, 感知价值正向影响购买意愿并且对其影响最大^[6]。已有研究表明, 消费者的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存在着负向的相互影响^[14]。基于感知价值理论, 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是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

1.2 感知风险

感知风险最初由哈佛大学教授 Bauer 将其引入消费者行为的研究, 他认为, 消费者实际上就是在承担着一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风险^[15]。Dowling 和 Staelin 给感知风险做了定义, 即“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和不利后果的可能性”^[16]。已有研究表明, 消费者感知风险越高, 购买意愿越低, 消费者感知风险与购买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6,17]。张应语等基于感知收益-感知风险框架研究生鲜农产品购买意愿, 证实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有负面影响^[12]。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进口冷链食品被频频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的影响下, 消费者对进口水产品的感知风险明显增加, 很可能对进口水产品的消费意愿产生巨大影响。

1.3 信任

信任在市场营销学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关系营销和渠道管理中。Anderson 认为, 信任是一种信念, 即对方会执行利于己方的行为, 不会做出损害交易伙伴利益的非预期行为^[18]。一般而言, 不确定性和

风险是信任产生的原因,信任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19]。建立信任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对交易双方至关重要。缺乏诚信和对卖家的不信任将减少消费者购买意愿^[20]。Pavlou 验证了感知风险和信任的关系,研究表明,信任可以直接影响到感知风险,也可以间接影响到消费意愿^[21]。信任在本文中表现为消费者对于海关检测进口水产品信任程度和冷链运输的信任程度,是消费者的主观感受。

1.4 知识

消费者掌握的知识量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感知风险,继而影响其消费意愿,而知识的不断积累也能够逐渐降低消费者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对产品相关知识的掌握和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12,22]影响其购买意愿。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知识表现为消费者对新冠肺炎疫情和进口水产品的认知程度。

1.5 总体态度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购买意愿,特别是新产品。在消费者决策中,个体通常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而形成正面或者负面的态度,而能否获取收益是影响消费者态度的主要前因之一。张汉鹏等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网站的总体态度显著影响其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从而影响消费意愿^[23]。根据俞明南等的研究,态度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于个人的感知收益和信任同样具有重要影响^[24]。本文中总体态度是消费者对进口水产品的整体评价,是否认为在疫情防控得当情况下,进口水产品可以放心食用。

综上所述,消费者购买决策是受外部情境与自身需求相互联动影响的心理过程,需要采用整体、多元视角进行分析。本文试图引入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索上述五种因素对消费意愿选择的联合效应,并揭示不同理论解释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本文的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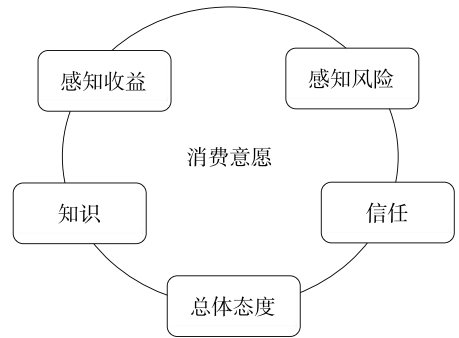


图 1 感知收益-感知风险框架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结合 2020 年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发生时间,选取了武汉、北京、大连、青岛和上海共 5 个城市的消费者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采取网络问卷形式发放调查问卷,在线上发放问卷之前,本团队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市临港自贸进口食品中心对消费者进行预调研测试,受访者在回答问卷过程中没有出现理解性偏误。网络问卷发放时间为 12 月 13—31 日,为保证样本分布地区代表性,对问卷回收进行了地区限制。本次调研总共收回问卷 898 份,在删除部分无效样本之后,最终采用的有效样本数为 779 份,样本有效率为 86.7%。

如表 1 所示,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多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 76.5%;五个地区的样本均占总样本的 20%左右;从年龄分布来看,31~40 岁的人群占有最大比例,为 33.6%,50 岁以上人群占比最少,这可能与问卷通过在线发放方式有关,年龄较大的人群对电子设备应用相对不熟练;家庭月总收入在 5 000~10 000 (不含)元的占比最高,为 36.7%;受访者中女性占比 61.9%,男性为 38.1%;来自城市的受访者明显高于农村,占总样本的 71.8%。

表 1 样本特征

特征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	特征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
学历	小学及以下	8	1.0	年龄	30 岁及以下	196	25.2
	初中	67	8.6		31~40 岁	262	33.6
	高中或中专	108	13.9		41~50 岁	192	24.6
	大专或本科	399	51.2		51~60 岁	91	11.7
	硕士及以上	197	25.3		60 岁以上	38	4.9

(续)

特征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	特征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
城市	武汉	145	18.6	家庭月总收入	5 000 元以下	159	20.4
	北京	133	17.1		5 000~10 000 (不含) 元	286	36.7
	大连	162	20.8		10 000~20 000 (不含) 元	207	26.6
	青岛	151	19.4		20 000~30 000 元	69	8.9
	上海	188	24.1		30 000 元及以上	58	7.4
性别	男	297	38.1	区域	农村	220	28.2
	女	482	61.9		城市	559	71.8

据调研数据显示,有效样本 779 人中,受访者非常不愿意购买进口水产品的有 112 人,比较不愿意的 115 人、一般愿意购买的为 331 人、比较愿意购买进口水产品的有 190 人和非常愿意购买的有 31 人,总体上积极的消费意愿占比 70.9%。有较强购买意愿的消费者大约 80%来自城市。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来检验感知收益、感知风险、知识、信任和总体态度五个因素作为前因条件如何相互作用来影响消费者对进口水产品的购买意愿。

QCA 方法最早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 Ragin 提出。QCA 是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为基础,采用整体的视角,进行跨案例的比较分析,致力于探索哪些条件要素的组态引起预期结果的出现、哪些组态引起预期结果缺乏或不存在等因果复杂性问题^[25-26],从而探索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对特定现象的“联合效应”。对比传统回归统计方法,QCA 的优势在于:第一,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主要适用于探索单个因素的“净效应”,QCA 则可以发现多种因素之间的组态关系和殊途同归^[27];传统基于相关分析的线性模型尽管可以解释 2~3 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交互作用,但对多个变量交互作用的分析就被限制,而 QCA 能够有效处理 3 个以上变量的交互效应^[28-29]。第二,QCA 整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点。传统的定量分析具有分析大样本和揭示样本间共性规律的优势,但变量分析只关注部分而非案例整体,忽视了个案的独特性。常规的定性研究方法聚焦于单个或某几个案例的整体和深入分析,但结论延展性和外部效度较差。QCA 弥补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不足,既对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

又对研究对象整体进行分析^[25-26]。

QCA 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sQCA)、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Multi-Valu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vQCA) 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本文的问卷数据多为五分量表数据,使用 fsQCA 能够更充分地捕捉到前因条件在不同水平或程度上的变化带来的细微影响^[27]。

2.3 数据与校准

2.3.1 信度与效度测量

本文采用 SPSS20.0 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经检验,各前因条件克朗巴哈系数 (Cronbachs, Alpha) 均大于 0.6,其次 KMO 值为 0.776,并在 0.001 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因而本文的量表具有良好效度,适合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最终共提取出 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与问卷设置相符合,解释了 68.57% 的总方差。量表聚合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 0.7,组合信度 (CR) 均大于 0.8,平均提炼方差 (AVE) 均大于 0.5,表明量表聚合效度良好。

2.3.2 数据校准

本文的五个前因条件来自感知风险-感知收益框架,每项前因条件下设二级指标,通过对其加权平均后计算出一级要素指标得分^[30]。采用直接校准法对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进行校准,以样本数据的 95% (完全隶属)、50% (交叉点)、5% (完全不隶属) 分位数取值作为校准锚点,使用 5 为完全隶属的阈值,3 作为交叉点,1 为完全不隶属的阈值,通过这 3 个阈值的设定,fsQCA 将这些值转换为 0~1 的模糊得分^[31]。变量赋值如表 2 所示,测量如下。

表 2 变量选择与赋值

变量	指标题项	测量项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感知收益	A ₁	进口水产品营养价值更高	非常不同意 (1), 比较不同意 (2), 一般 (3), 比较同意 (4), 非常同意 (5)	2.44	0.97
	A ₂	进口水产品新鲜度更好	非常不同意 (1), 比较不同意 (2), 一般 (3), 比较同意 (4), 非常同意 (5)	2.35	0.96
	A ₃	进口水产品口感更好	非常不同意 (1), 比较不同意 (2), 一般 (3), 比较同意 (4), 非常同意 (5)	2.54	1.01
	A ₄	进口水产品品牌知名度更高	非常不同意 (1), 比较不同意 (2), 一般 (3), 比较同意 (4), 非常同意 (5)	2.61	0.99
	A ₅	进口水产品安全性更高	非常不同意 (1), 比较不同意 (2), 一般 (3), 比较同意 (4), 非常同意 (5)	2.22	0.92
感知风险	B ₁	消费进口水产品时, 我特别考虑食品安全风险	非常不同意 (1), 比较不同意 (2), 一般 (3), 比较同意 (4), 非常同意 (5)	4.19	1.07
	B ₂	如果我食用进口水产品, 会感染新冠病毒	非常不同意 (1), 比较不同意 (2), 一般 (3), 比较同意 (4), 非常同意 (5)	3.88	1.12
知识	C ₁	是否知道进口水产品外包装上会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是 (1), 否 (0)	0.82	0.38
	C ₂	是否知道新冠病毒可在冷冻条件下长期存活并“由物传人”	是 (1), 否 (0)	0.91	0.28
	C ₃	是否知道在盒马鲜生, 进口海鲜的电子标签上全都加上了“溯源码”, 扫码就能查看对应商品批次的核酸检测报告	是 (1), 否 (0)	0.66	0.48
信任	D ₁	对海关检测进口水产品新冠病毒的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 (1), 比较不信任 (2), 一般 (3), 比较信任 (4), 非常信任 (5)	3.45	0.93
	D ₂	对冷链物流运输进口水产品安全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 (1), 比较不信任 (2), 一般 (3), 比较信任 (4), 非常信任 (5)	3.02	0.93
总体态度	G	总的来说, 如果疫情防控得当, 进口水产品可以放心食用	非常不同意 (1), 比较不同意 (2), 一般 (3), 比较同意 (4), 非常同意 (5)	3.18	1.04
消费意愿	Y	总的来说, 我愿意购买进口水产品	非常不同意 (1), 比较不同意 (2), 一般 (3), 比较同意 (4), 非常同意 (5)	2.89	1.06

3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3.1 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模糊集真值表分析之前,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 从集合论角度而言,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就是检验结果集合是否为某个条件集合的子集。在 fsQCA 中, 当结果发生时, 某个条件总是存在, 那么该条件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31]。一致性为检验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 当其大于 0.9 时则认为该前因条件为结果的必要条件, 目前,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保留必要条件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32]。但要注意事先排除与必要条件不一致的逻辑余项假设进入最小化程序, 从而避免必要条件被消除的风险^[33]。本文使用 fsQCA3.0 对各前因条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 如

表 3 所示。

表 3 前因变量的必要条件检验

前因条件	强消费意愿		弱消费意愿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感知收益	0.627 4	0.886 3	0.499 2	0.750 6
~感知收益	0.823 5	0.607 1	0.924 4	0.725 3
感知风险	0.878 0	0.557 6	0.937 7	0.633 7
~感知风险	0.423 2	0.864 6	0.345 3	0.750 8
知识	0.879 4	0.550 0	0.874 6	0.582 1
~知识	0.331 9	0.713 2	0.323 9	0.740 8
信任	0.839 9	0.709 6	0.745 9	0.670 6
~信任	0.610 1	0.692 8	0.677 0	0.818 2
总体态度	0.917 3	0.796 2	0.663 9	0.613 3
~总体态度	0.554 5	0.607 9	0.779 4	0.909 4

注：“~”表示该条件缺席。

根据表 3 对强消费意愿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显示,除总体态度以外,其他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 0.9,表明总体态度是强消费意愿的必要条件,应予以保留。对弱消费意愿的必要条件的分析中,~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是其必要条件。

3.2 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试图揭示的是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致结果产生的充分性分析。从集合论角度而言,也就是探索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代表的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34]。同样使用一致性来衡量组态的充分性。真值表需要按照频数和一致性进行筛选^[35]。由于频数描述了所在组态覆盖的样本数量,为了确保获得用于评估关系的最小个案数,需要设置频数阈值。对于大于 150 例的样本,频数阈值可设置为 3 (或更高);而对于较小的样本,频数阈值可设置为 1^[9,35]。本文样本是 779,频数设置为 3,并且所有频数较小的组合都从进一步分析中剔除。筛选频数后,应该设置一致性阈值,最小推荐值 0.75^[27],本文样本属于大数据,采取更严格的阈值 0.85。PRI (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一致性是被用来避免结果和结果否定中组态的同时子集关系,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5]的建议,将 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7。

fsQCA 会输出三类解:复杂解(不包含“逻辑余项”)、简约解(包含“逻辑余项”,未评估其合理性)和中间解(仅限于将符合理论和实际知识的“逻辑余项”纳入解),本文以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前因条件标记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而未出现于简约解的前因条件标记为边缘条件,最终以中间解作为呈现结果,并辅之以简约解^[9]。覆盖度是 QCA 研究中衡量经验相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的是组态的经验切题性或重要性^[31],类似于回归中的 R^2 ^[9]。

3.2.1 强消费意愿路径组态

如表 4 所示,fsQCA 分析得出产生满足强消费意愿的路径有 3 条,且 3 个组态的一致性指标分别为 0.935 8、0.940 9、0.965 3,这说明 3 个组态都是强消费意愿的充分条件。而总体一致性指标为 0.925 4,说明其大于可接受最低标准 0.75。总体覆盖度为 0.632 0,表明这 3 个组态解释了 63.20% 的强消费意愿的案例。

表 4 导致强消费意愿的组态

前因条件	路径 1	路径 2	路径 3
感知收益		●	●
感知风险	○		●
知识	●		○
信任	●	●	
总体态度	●	●	●
一致性	0.935 8	0.940 9	0.965 3
覆盖度	0.370 6	0.557 2	0.253 5
唯一覆盖度	0.061 9	0.167 0	0.013 0
总体一致性	0.925 4		
总体覆盖度	0.632 0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席,◐=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席,“空格”表示该条件无关紧要(可存在亦可缺席)。表 5 同。

路径 1 中,感知风险的缺席和总体态度的存在是引致强消费意愿的核心条件,表明与其他条件相比,感知风险的缺席和总体态度的存在对强消费意愿而言更加重要。此外,信任和知识的存在发挥了辅助作用。该路径能解释 37.06% 的强消费意愿案例,且有 6.19% 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解释。

感知收益、信任和总体态度的共同存在是路径 2 实现强消费意愿的核心条件。该路径能解释 55.72% 的强消费意愿案例,有 16.70% 仅能被这条路径解释。

路径 3 表明,感知收益的存在、知识的缺席和总体态度的存在是实现强消费意愿的另一核心条件,感知风险的存在起到该路径的辅助作用。该路径能解释 25.35% 的案例,有 1.30% 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

3.2.2 弱消费意愿路径组态

如表 5 所示,fsQCA 分析得出产生满足弱消费意愿的路径有 3 条,且 3 个组态的一致性指标分别为 0.936 7、0.954 1、0.943 2,这说明 3 个组态都是弱消费意愿的充分条件。而总体一致性指标为 0.927 7,表明其大于可接受最低标准 0.75。总体覆盖度为 0.736 2,说明这 3 个组态解释了 73.62% 的弱消费意愿的案例。

表 5 导致弱消费意愿的组态

前因条件	路径 N1	路径 N2	路径 N3
感知收益	○		○
感知风险	●	●	
知识		●	●
信任		○	●
总体态度	○	○	○
一致性	0.936 7	0.954 1	0.943 2
覆盖度	0.717 1	0.506 7	0.551 5
唯一覆盖度	0.100 0	0.008 2	0.010 8
总体一致性		0.927 7	
总体覆盖度		0.736 2	

路径 N1 中, 感知风险的存在、感知收益和总体态度的缺席在引致弱消费意愿的路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该路径能够解释 71.71% 的弱消费意愿案例, 有 10.00% 的弱消费意愿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解释。

路径 N2 表明, 感知风险和知识的存在以及信任和总体态度的缺席是可以用于解释弱消费意愿的又一条件组态, 其同时为核心条件。该路径可以解释 50.67% 的弱消费意愿案例, 有 0.82% 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

对路径 N3 而言, 感知收益和总体态度的共同缺席是导致弱消费意愿的核心条件, 知识和信任的存在是辅助条件, 该路径能解释 55.15% 的弱消费意愿案例, 有 1.08% 的弱消费意愿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

3.3 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结果的可靠性, 张明和杜运周研究提出了检验 QCA 稳健性的方法, 常见的手段包括调整校准阈值、改变案例频数、变动一致性门槛值、增加其他条件、补充或删除案例等^[32]。本文采用将一致性门槛值 0.85 变为 0.90 和将案例数阈值由 3 变为 5, 产生的组态基本一致, 结果的解释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稳健性检验显示结果稳健。

3.4 讨论

3.4.1 强消费意愿驱动机制分析

根据形成强消费意愿 3 条路径的核心条件和背后的解释逻辑, 本文将其分为两种类型: 感知风险主导型和感知收益主导型, 其共同之处在于积极的

总体态度是强消费意愿的前提。感知收益主导型又可以细分为政府依赖型和品牌忠诚型。

感知风险主导型 (路径 1)。该组态结果表明, 该类型消费者对风险极其敏感, 只要其感知到的风险越低,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购买进口水产品的可能性就更大, 而具备新冠病毒及相关检测知识, 会让高信任度的消费者产生强消费意愿, 进一步促成购买行为; 对产品的信任会降低消费者对风险的感知, 侧面也证实了感知风险越低, 消费意愿越强^[36]。感知风险主导型消费主要分布在上海地区, 此类型消费者的家庭月总收入为 10 000 元以上, 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大专或本科。有研究表明, 收入越高, 风险感知程度越小; 受教育程度越高, 风险感知程度越小^[37]。因为消费者有较好的物质资本就有更多的能力承担风险, 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接触的知识相对较多, 识别风险的能力越强, 风险敏感度越低。对于此类消费者, 政府和企业主要通过降低其感知风险水平, 促进消费。

政府依赖型 (路径 2)。该组态结果表明, 对政府高度信赖的消费者, 往往具有良好进口水产品市场预期, 能够感受到高的感知收益, 在很大程度上会购买进口水产品。这得益于中国防疫措施得力, 防疫工作常态化。对于关注度较高的信息, 政府越及时全面地公布, 越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提高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度^[38]。政府依赖型消费者集中在上海地区, 原因可能在于上海实行冷库疫情管理制度常态化, 在 2020 年 12 月已实现进口冷链食品全流程可追溯管理; 政府监管措施到位, 信息透明化, 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在全球疫情仍较为严重的情况下, 各地海关能否确保进口冷链食品百分之百检测, 以及不让问题进口水产品流入市场, 是提高消费者对其信任的关键, 进而刺激国内进口海鲜市场。

品牌忠诚型 (路径 3)。该组态结果表明, 对品牌忠诚的消费者, 往往更注重产品带来的价值并且具有良好的产品预期, 即使感知到风险存在, 在不了解相关知识的情况下, 对品牌认可的盲目性仍然会使其保持强消费意愿。品牌忠诚度高度的消费者因为长期购买该品牌, 因此对品牌抱有积极的正面情感和经验, 当接触到负面消息时更容易将原因归咎于外部环境, 而缺乏关注信息

本身^[39]。此类消费者同时具备品牌忠诚型和盲目性的特点。企业主要通过最大化该类型消费者感知收益,提高品牌满意度来促进消费^[40]。同属于感知收益主导型,根据覆盖度指标,政府依赖型比品牌忠诚型解释了更多的案例,在条件因素可控性方面更适合用以提高消费者对进口水产品的购买意愿。

3.4.2 弱消费意愿驱动机制分析

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的重要性在弱消费意愿的条件组态中进一步得到验证。路径 N1 中,消费者在消极总体态度下,感知收益缺席,反而存在感知风险,则不愿购买进口水产品;该路径消费者主要分布在青岛地区。青岛属于临海城市,当地海鲜质优价廉、品种繁多,消费者对进口水产品感知收益相对较低。2020 年 10 月,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青岛首次找到充分的证据链,证明新冠病毒可由物传人、冷冻条件可长期存活,该地区消费者对进口水产品的感知风险相对较高;该组态既不具备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感知收益最大化特征,也不具备感知风险最小化特征,所以消费者对进口水产品购买意愿较弱。

路径 N2 显示,总体态度的消极情绪以及感知风险的存在,且信任缺失情况下,具备相关知识的消费者不愿冒险购买进口水产品。该组态的消费者主要特征为家庭月总收入在 5 000 元以下。研究表明,突发重大疫情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感知到风险对其自身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41],消费者出于自身安全和收入的考虑,购买决策行为更加谨慎。综合路径 N1 和 N2,感知风险被证实为消费意愿的“抑制剂”^[6]。

对路径 N3 而言,与 N1 相似的是总体态度和感知收益的缺席。具备新冠病毒及检测相关知识的消费者,尽管信任海关检测与冷链运输,但对进口水产品消费意愿非常低,表明感知收益作用于消费者选择并对其消费意愿具有重要影响^[42]。路径 N3 的消费者主要集中在青岛地区,原因可能在于青岛人本身有消费当地海鲜的习惯,对进口水产品的感知收益相对较低。总的来说,让消费者对于进口水产品持有积极的态度是其产生购买意愿的前提,继而是最大化消费者的感知收益或者最小化其感知风险,这是政府和企业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感知收益-感知风险框架,采用了 fsQCA 方法对感知收益、感知风险、知识、信任和总体态度 5 个变量与消费意愿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展开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论如下:①消费者对进口水产品的购买意愿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研究发现有 3 条路径可促使强消费意愿:第 1 条是低感知风险导向,积极总体态度和具备知识与信任的组合,即感知风险主导型。第 2 条是感知收益导向,高信任度和积极总体态度的组合,即政府依赖型。第 3 条是感知收益导向,持有积极总体态度和存在感知风险,却不具备丰富知识的组合,即品牌忠诚型。②弱消费意愿驱动机制有 3 条路径,且与强消费意愿存在不完全对称性关系。③组态间比较发现,总体态度在所有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说明其为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感知收益最大化情境下,有 2 条形成强消费意愿路径,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替代。本文运用 fsQCA,挖掘了形成进口水产品强消费意愿背后复杂的互动本质和提升消费意愿的路径,为刺激与恢复进口水产品消费市场提供了一个可选的分析框架,丰富了现有消费意愿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为之后购买意愿的具体情境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针对感知风险主导型消费者,关键在于降低其感知风险,提振消费者信心。政府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以及新媒体平台及时向消费者传递进口检测信息并普及相关食用知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让消费者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能谨慎对待进口水产品并且放心的购买食用。第二,对于政府依赖型消费者,国家海关要加强检测力度和强度,提高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此外,消费者购买进口水产品看重的是价值,商品本身能带来感知收益,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带来好的市场预期则是政府和企业要重点考虑的。第三,对于品牌忠诚型消费者,企业不仅应该重视产品质量,为客户提供优质水产品,更重要的是保障服务质量,实现产品可追溯,检测信息和运输过程透明化,及时且有效地满足消费者售后需求,提升其满意度,进而加强品牌忠诚度。第四,5G 技术应用于商业领域使得电商直

播进入爆发期,高度可视化界面和实时互动增加了消费者的现场带入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意愿^[43]。进口水产品企业线上销售可安排直播方式,利用直播的视觉通达性使得消费者能观察水产品的外观和新鲜度,更加直观地了解商品,从而降低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同时定期开展进口水产品售后直播,包括清洗、烹饪、储藏等一系列程序,推荐产品并针对咨询答复,使得消费者能学到水产品处理技巧以及营养知识等,进一步促进消费者价值感知,从而刺激进口水产品消费。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8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B/OL]. (2018-07-09) [2021-05-09]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
- [2] 张瑛, 赵露. 中美水产品消费需求对比研究及其启示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5): 77-84.
- [3] 赵明军, 孙慧武, 王宇光, 等. 基于居民营养需求的中长期水产品供给与消费研究 [J]. 中国渔业经济, 2019, 37 (6): 1-14.
- [4] 张静宜, 陈洁, 刘景景. 中国水产品消费转型特征及对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示 [J]. 中国渔业经济, 2019, 37 (3): 8-14.
- [5] 刘景景, 张静宜, 陈洁.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水产品国际供应链变化及中国水产品安全供给形势分析 [J]. 世界农业, 2021 (1): 20-27.
- [6] 党伊玮, 宋灏岩. 消费者购买东帝汶进口水产品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世界农业, 2019 (9): 53-58.
- [7] 王建华, 高子秋. 基于行为特征因素及情境因素的消费者安全认证猪肉购买路径分析: 来自华东地区 12 市的微观调查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5): 113-127.
- [8] 贾培培, 李东进, 金慧贞, 等. 信誉标签结构线索对消费者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23 (2): 179-190.
- [9]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su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 (2): 393-420.
- [10] UELAND Ø, GUNNLAUGSDOTTIR H, HOLM F, et al. State of the art in benefit-risk analysis: consumer perception [J].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12, 50 (1): 67-76.
- [11] 陈凯, 顾荣, 胡静. 基于感知收益-感知风险框架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研究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8 (2): 61-70+112.
- [12] 张应语, 张梦佳, 王强, 等. 基于感知收益-感知风险框架的 O2O 模式下生鲜农产品购买意愿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15 (6): 128-138.
- [13] ZEITHAML V A.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 quality, and value: 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8, 52 (3): 2-22.
- [14] 张文静. 转基因食品消费行为研究 [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 [15] BAUER R A. Consumer Behavior as risk taking dynamic marketing for a changing world [M]. Chicago: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60.
- [16] DOWLING G R, STAELIN R. A model of perceived risk and intended risk-handling activity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4, 21 (1): 119.
- [17] WANG Y, HAZEN B T. Consumer product knowledge and intention to purchase remanufactured produc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5, 181: 460-469.
- [18] ANDERSON W. A model of distribution firm and manufacture firm working partnership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0, 54 (1): 42-58.
- [19] 赵冬梅, 纪淑娴. 信任和感知风险对消费者网络购买意愿的实证研究 [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0, 29 (2): 305-314.
- [20] SHIN J I, CHUNG K H, OH J S, et al. The effect of site quality on repurchase intention in Internet shopping through mediating variables: the cas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outh Kore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3, 33 (3): 453-463.
- [21] PAVLOU P. Consumer acceptanc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tegrating trust and risk with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03, 7 (3): 101-134.
- [22] CHAUDHURI A. Product class effects on perceived risk: the role of emo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formation Marketing, 1998, 15: 157-168.
- [23] 张汉鹏, 陈冬宇, 王秀国. 基于网站和卖家的 C2C 消费者购买意愿模型: 感知收益与风险的转移 [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3, 32 (4): 718-726.
- [24] 俞明南, 王成成, 高翔. 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购买意愿的形成机制: 基于官翻手机的扎根理论研究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16, 9 (4): 368-382.
- [25]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 (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J]. 管理世界, 2017 (6): 155-167.
- [26] 程建青, 罗瑾琰, 杜运周, 等. 制度环境与心理认知何时激活创业?: 一个基于 QCA 方法的研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9, 40 (2): 114-131.

(下转第 32 页)

● 政策研究

构建“绿箱”补贴政策体系的国外经验与优化对策

◆ 王颖¹ 魏佳朔¹ 高鸣²

(1.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083;
2.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810)

摘要:“绿箱”补贴政策是 WTO 规则许可的农业国内支持措施之一。近年来,各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探索建立符合本国农业实际的“绿箱”政策体系,并积极对接国际贸易规则,适时调整“绿箱”政策措施的支持总量、结构和效率。本文分析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国内“绿箱”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近年来“绿箱”政策改革趋向,总结了国外“绿箱”政策体系建设的异同点,认为国内“绿箱”政策体系仍存在补贴总量不足、补贴面广且分散,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有待加强、农业绿色发展支持保障不足等问题。对此,中国需要继续保持收入补贴的总体规模稳定,合理设计收入保险的保费补贴机制,进一步增强农业绿色发展支持的政策实效,并深入参与全球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治理,以期构建结构合理、精准高效的“绿箱”补贴体系。

关键词:“绿箱”补贴; 农业支持政策; WTO 规则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1.10.003

1 引言

WTO 在 1995 年通过的《农业协定》对国内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划分为“绿箱”“黄箱”“蓝箱”和“发展箱”四个类别^[1-2]。其中,“绿箱”政策是指和生产脱钩,对农业生产和市场扭曲极小的支持措施,不设支持规模上限。中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初步构建起了以“四项补贴”为基础的政策体系^①,对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显著的积极效果^[3]。

但在“四项补贴”的政策设计上,仅有粮食直接补贴是以承包地面积为基准,与生产脱钩的“绿箱”政策。尽管地方政府因为执行成本过高,在实践中将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简化为同样以承包地面积为基准的脱钩收入补贴,但在政策设计以及

向 WTO 的通报上,都还是属于“黄箱”性质,存在“箱体”错用的问题^[4]。一直到 2016 年开展农业补贴政策改革,推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但目前,无论是

收稿日期: 2021-08-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收入性补贴对粮食生产率的影响: 作用机理、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7180309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常态下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15CZZJ03)。

作者简介: 王颖(1996—), 女, 四川遂宁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粮食安全与农业农村政策, E-mail: wangying3670@cau.edu.cn; 魏佳朔(1996—), 男, 河北衡水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E-mail: wjs2049@163.com。

通信作者: 高鸣(1989—), 男, 湖南汉寿人,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粮食安全与农业农村政策, E-mail: gaoming@agri.gov.cn。

① “四项补贴”具体包括: 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

对标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还是对比发达国家的“绿箱”补贴政策体系, 中国的“绿箱”补贴政策仍然存在着总量不高、方式不全、效果不强等突出问题^[5]。

2015、2018、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都对“绿箱”政策提出了明确的发展要求, 具体目标是要扩大“绿箱”支持政策实施的规模和范围,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这一政策目标符合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也符合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演进规律。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使用“绿箱”补贴政策, 特别是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支持, 早已成为世界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主要发展方向^[6]。

因此值得思考的是,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在“绿箱”补贴政策方面有哪些新措施、新变化, 这些新措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不同国家之间的“绿箱”补贴政策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回答好这些问题, 对构建完善中国的“绿箱”补贴政策体系,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围绕“绿箱”补贴政策的国外经验, 现有研究着重研究了发达经济体的农业补贴政策, 如李俊松和李俊高基于“农业发展三阶段论”对美国、日本、欧盟农业补贴制度的历史嬗变进行了分析, 认为存在“由价格补贴转向直接收入补贴、由补贴农民转向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补贴水平不断增长”的趋势^[7]; 林学贵对美国、欧盟、日本“绿箱”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强调在实现农业支持向“绿箱”转变的同时, 也应当注重对其总量的控制^[8]。更多的学者分国别论述了不同经济体的农业补贴政策演变, 以求从其发展经验和实施效果中提炼出完善农业支持补贴的有效建议。以美国为研究对象, 冯继康总结了美国农业补贴政策演变中, “黄箱”政策逐渐减少、支持农业和农民发展的“绿箱”政策不断增加的历史逻辑^[9]。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 美国农业补贴中的“绿箱”比例大, 而中国的“黄箱”占比较多^[10]。齐皓天等^[11]、刘超等^[12]着重分析了美国农业支持政策与 WTO 规则的一致性, 并解析了美国将“黄箱”政策体系中的收入保险保费补贴以“绿箱”名义向 WTO 进行通报的主要做法。以日本

为研究对象, 朴英爱和付兰珺梳理了日本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历史沿革, 认为涵盖山区半山区、环境保护型、农业多功能性直接补贴的政策体系展现了日本以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施策目标^[13]; 周建华和贺正楚强调了日本以基础设施投入和农业科研投入为重点, 不断强化了“绿箱”政策的使用^[14]; 王鑫和夏英从农业收入保险入手, 分析了日本囊括农业共济政策、收入减少影响缓和政策、蔬菜价格稳定政策和收入保险等在内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认为其能有效满足小农户多元化保障需求、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15]。以欧盟为研究对象, 娜仁图雅和蓝志勇解析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改革趋势, 认为追求绿色化、生态化、“绿箱化”和多功能性是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的未来目标^[16]; 王军杰和申莉萍认为, 欧盟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主线是促进农业发展、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未来仍将贯彻“推进绿箱化”的改革目标^[17]。

以上研究为构建中国“绿箱”补贴政策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国外实践与经验, 但不足之处表现为: 一是涉及的政策措施相对陈旧, 不能准确反映近年来各国在“绿箱”补贴政策上的新措施、新变化; 二是基于国际之间、国内外之间的比较分析不足, 对各国“绿箱”补贴政策特点的提炼总结不足; 三是研究视角分散, 现有研究更多从某一特定的农业支持政策出发, 分析其形成背景和制度框架, 少有研究从系统的政策体系视角, 分析国外“绿箱”措施中各类补贴政策的内在运行机制和各自作用。针对上述不足, 本文从主要发达国家的“绿箱”政策体系实施情况入手, 分析近年来“绿箱”政策改革趋向, 总结国外“绿箱”政策体系建设的异同点, 再对中国“绿箱”政策体系构成与存在的不足进行梳理, 最后提出优化国内“绿箱”政策体系的相关建议。

2 构建“绿箱”政策体系的国外经验

2.1 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绿箱”政策实施情况

近年来, 在 WTO 框架要求下许多国家或地区不断完善其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对“绿箱”政策措施进行了结构性调整,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代表的“绿箱”政策体系。美国、日

本、欧盟在推进和改革“绿箱”政策方面做出了不少探索,且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因此,本文选取美国、日本、欧盟作为代表,分析其构建“绿箱”政策体系的相关经验,以期更清晰地呈现不同“绿箱”政策手段的差异,从而为中国“绿箱”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参考。

2.1.1 美国“绿箱”政策实施情况

近年来,为规避WTO规则限制,美国越发重视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逐渐减少政府对农民生产决策和农产品市场的干预,不断追加财政支持、丰富“绿箱”政策手段。自1996年《联邦农业发展和改革法案》颁布以来,美国加大了对耕地与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等的直接收入和一般服务支持,以财政补贴手段引导农场主保护耕地湿地、促使生态脆弱区耕地休耕,并开启农作物商品项目改革,逐步构建了高素质农民收入保护网^[18]。2014年的《新农业改革法案》进一步丰富了农业保险与灾害补贴手段,通过市场化有偿方式弥补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损失和因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的收入损失。为进一步提高农业支持政策实效,美国不断扩大“绿箱”支持总量,由传统的以目标价格和贷款差额支付为主的价格支持政策逐步转向以直接收入为主的收入支持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也重视调整“绿箱”政策结构,当前“绿箱”措施涵盖国内食品援助(主导项目包括食品券计划、儿童营养计划、对妇女婴儿的特殊营养补充计划)、政府一般服务支出、脱钩收入支持政策、环境项目、自然灾害援助、投资援助结构调整共6项,各占“绿箱”平均支持总量的70.0%、14.0%、6.8%、3.9%、1.1%和0.4%^[19]。《2018年农业提升法案》明确未来五年(2019—2023年)美国将继续支持营养项目发展,支持农业保险覆盖更多作物品种、加强对农民的风险教育和保险培训;同时,还增加了对资源保护项目的财政预算,支持休耕保育和环境质量激励项目^[20]。

2.1.2 日本“绿箱”政策实施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农业补贴政策以提升农业竞争力为施策目标,并依据《农业基本法》对大多数农产品实行不同类别的价格支持政策,涵盖了成本与收入补偿、最低保护价格、价格差额补贴等方面;还制定了包括农民直补、自然灾害损失补

贴和农业保险补贴在内的直接收入补贴体系。由于直接价格补贴和生产补助金严重扭曲了市场和贸易,在《农业协定》的规则条例下日本政府承诺削减农产品价格支持措施,调整国内“绿箱”支持量。1999年《粮食、农业和农村基本法》出台以来,日本以支持农业多功能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农村基础生产生活条件为施政目标,逐渐加大对农业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深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技推广和人才培养领域,积极构建具有日本特色的“绿箱”补贴政策。2003年修订的《农业灾害补偿法》首次重视构建农业收入保险体系,并于2017年正式颁布《农业收入保险制度介绍·农业灾害补偿制度改革准备支持项目实施纲要》,并在具体实践中逐步扩大保险保障范围。目前,日本发展了包括政府一般服务支出、环境计划下的支出(涵盖了稻米转作补贴、环境友好型养殖补贴、水土保持和环境改善补贴等)和生产者退休计划下的结构调整援助在内的“绿箱”支持政策体系^[21-22]，“绿箱”支持水平逐步稳定并逐渐占据日本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主导地位。

2.1.3 欧盟“绿箱”政策实施情况

长期以来,欧盟以共同农业政策作为农业农村政策的主体,重视对农业发展的高水平支持和保护。为促进农产品供需平衡,1992年欧盟推出麦克萨里(McSharry)改革方案,降低农业价格支持水平,实施与生产部分脱钩的直接收入补偿,对大型农场发放休耕补贴,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和乡村环境保护。为提高欧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1999年欧盟通过了《2000年议程》,大力支持“绿箱化”改革。2003年欧盟启动“农业多功能性”改革,削减农产品价格支持,并将削减的挂钩直补资金转移到与生产脱钩的单一农场支付项目,同时实行“强制性动态调整机制”,将直接支持大农村的资金调整到农村发展和结构调整计划中,促进价格支持手段进一步向直接支付手段过渡。虽然脱钩直补改革措施未得到完全落实,但欧盟农业部门在2008年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健康检查”,保留对产奶奶牛、山羊和绵羊的挂钩直补,明确对其余农产品实行脱钩直补。随着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推进,欧盟“绿箱”支持规模逐步扩大。2013年以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在保障粮食安全、

自然资源可持续和区域平衡发展方面有了新的拓展,重点改革了农业补贴制度,由单一农场支付过渡到基本补贴,强化了与农业生产脱钩、涵盖永久草地保护、种植多样性和最低生态利益面积的绿色直接补贴,加大对中小农户和青年农户的补贴力度,并完善了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与均衡发展为目标、以脱钩直接补贴为主导的综合性支持政策架构。同时,欧盟不断加大补贴力度以激励农户保护自然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同时鼓励乡村旅游和休闲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也支持利用环境保护项目和文化建设项目促进村庄建设^[23]。2018年欧盟《关于未来食品和农业的立法建议》中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规章架构,将改革现行绿色给付的管理方式,加大对中小型农地补贴额度;提升乡村地区竞争力,加强对农民在使用风险管理工具、农业投资等方面的培训和补偿力度;采取因应气候变迁行动,强制要求农民维护湿地和泥炭地、监控与改善水质、实行作物轮作^[24]。总体来看,虽然欧盟的“绿箱”化过程较为缓慢,但在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行机制下逐步去除价格支持,实现了从“黄箱”到“绿箱”的转移,并最终形成了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支柱^[17]。随着新一轮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欧盟将继续在优化农业补贴计划、推进粮食体系可持续转型、发展环保和可持续农业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2.2 近年来“绿箱”政策改革趋向

2.2.1 完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农业直接补贴作为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帮助规避WTO“黄箱”政策约束,又有利于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生产者收入预期。在探索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过程中,美国逐步建立了平均农作物收入选择补贴和直接支付补贴(表1)。其中,平均农作物收入选择补贴以农产品产量下降或市场价格降低为政策启动条件,当种植农作物的成员州实际收益和农场实际收益小于平均农作物收入选择补贴的保障收益时,政府将根据过去五年的平均产量和过去两年的平均价格动态确定平均农作物收入补贴额度并直接发放给农户,从而有效解决农作物生产率低问题。美国相关农业法规定直接支付补贴与产量、价格脱钩,以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

单产、农产品的支付率为补贴依据,补贴囊括小麦、大麦、玉米、大米、高粱、燕麦等在内的多种作物,每年补贴额度基本稳定在50亿美元。

与WTO“绿箱”补贴规定相适应,日本实施的农业直接补贴与产量和价格脱钩,以耕地倾斜度、有机肥施用量、农地维护及地域资源质量提升作为补贴支持依据,着力优化农村水渠、农用道路、环保等基础生产生活条件。日本的农业直接补贴主要以山区半山区农业直接补贴为基础,以环境保护型补贴政策和农业多功能性补贴政策为支撑,还涵盖以支持农业规模化生产、拓展农业多功能性、保护农村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等目标的附加补贴,具有明显的“三位一体”特征^[13](表1)。山区半山区农业直接补贴旨在为倾斜度大、草地比例高和弃耕率高等生产条件不利地区提供支持,锚定签署个人或村落协议并在五年协议期内持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户和农业组织,每年补贴总量可达510亿~542亿日元。从补贴构成来看,山区半山区农业直接补贴包括基础补贴和附加补贴,其中基础补贴额度按土地类型进行分配,从高到低依次为稻田、旱地、草地、放牧地;附加补贴致力于推进村落合作和协定广域化、强化村落机能、提高生产性、振兴指定的梯田地区,补贴标准在每公顷30000~100000日元。日本的环境保护型补贴政策以发展环境保护型农业、降低温室效应、促进生物多样性为施策目标,锚定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主要农作物学习环保技术、削减化肥与农药使用量超过50%的农户及农业组织,具体补贴类型按单价从高到低分别为绿肥作物补贴、堆肥作物补贴、有机作物(荞麦等杂粮作物、饲料作物)补贴。环境保护型补贴由日本各都道府县进行发放,对不同对象每公顷补贴30000~80000日元。日本农业多功能性补贴政策由农地·水保护管理补贴政策演变而来,旨在改善农业地域资源质量、延长农用设施使用寿命,以不同地形条件下农业生产条件为依据每公顷发放1200~44000日元的基本补贴。总体来看,日本在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改革中不断拓展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内涵和实现手段,在激励农户投入生产要素、稳定耕地面积、增加农业产出、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

表 1 完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国家	政策措施
美国	<p>平均农作物收入选择补贴：以农产品产量下降或市场价格降低为政策启动条件，当成员州实际收益和农场实际收益小于平均农作物收入选择补贴的保障收益时，政府根据过去五年平均产量和过去两年平均价格动态确定补贴额度并直接发放给农户</p> <p>直接支付补贴：与产量、价格脱钩，以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产、农产品的支付率为补贴依据，补贴囊括小麦、大麦、玉米、大米、等多种作物</p>
日本	<p>农业直接补贴：与产量和价格脱钩，以山区半山区农业直接补贴为基础，以环境保护型补贴政策和农业多功能性补贴政策为支撑，具有明显的“三位一体”特征</p>

2.2.2 探索农业收入保险补贴

农业收入保险补贴以投保人的整体农业收入为承保对象，与特定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脱钩，能够通过锚定收入，从产量与价格双链条加强风险防控，对于稳定农民收入、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业收入保险补贴前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数据收集、模拟实验和立法程序，2019年该项补贴制度出台后在锚定农民收入、防范经营风险与市场风险、提升农业竞争力等方面效应显著。区别于之前施行的农业共济制度、收入减少影响缓和政策、蔬菜价格稳定政策等主要收入保障政策，农业收入保险补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由日本全国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统一协调管理，将收入保险申请

办理、保险金支付等相关业务委托给农业共济组合、市町村、保险公司等；承保范围广，覆盖了种植业、出售的农作物、农产品等；以投保人历史收入作为测算依据并对基准收入进行适当修正，根据进行蓝色申报的农业生产者整体收入制定个性化保险计划；着力完善“一次性保险方式+非一次性的积累方式”赔付机制，承保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减少和市场原因导致的价格降低、投保人在尽职经营过程中因意外导致的销售收入减少，还考虑到投保人当年收入为零的意外状况并灵活设定合理的赔付标准^[19]。日本政府全方位多维度地参与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的法制化运行、普及宣传和信息基础设施保障，还对收入保险提供保费补贴和再保险服务（表2），促使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表 2 探索农业收入保险补贴

阶段	政策措施
日本	<p>以提高农民收入、防范经营风险与市场风险、提升农业竞争力为目标，由全国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统一协调管理，相关业务可委托给农业共济组合等，承保范围广</p> <p>着力完善“一次性保险方式+非一次性的积累方式”赔付机制</p> <p>政府全方位多维度地参与到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的法制化运行、普及宣传和信息基础设施保障中，还对收入保险提供保费补贴和再保险服务</p>
美国	<p>以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入增长、规避WTO规则约束为目标</p> <p>包括收入保障保险、实际历史收入保险、区域收入保障、全农场收入保障项目、堆叠收入保障计划、针对特殊农作物的保险产品（核桃收入保险）、基于县域水平的补充保障选项</p> <p>产品种类丰富，保险单元多样，补贴差异化特征明显</p>

美国的农业收入保险起源于1996年开始的收入保险计划，旨在同时对自然风险或市场风险造成的减产或因产品价格下跌导致的收入损失进行补贴，本质上是政府借保险公司之手向农民发放补贴，从而实现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入增长、规避WTO规则约束的目标。具体实践中，美国农业部

下属的风险管理局负责牵头收集整理农业生产基础数据、批准保险产品与费率、管理协调保费支出，由指定的17家商业性保险公司负责实施具体业务^[11]。美国2014年颁布的《新农业改革法案》对保险覆盖水平和赔付制度进行了完善，并逐步形成农业收入保险占主导地位的保险产品体系。当前，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补贴主要包括收入保障保险、实际历史收入保险、区域收入保险、全农场收入保障项目、堆叠收入保险、针对特殊农作物的保险产品(核桃收入保险),以及基于县域水平的补充保障选项^[25]。收入保障保险与全农场收入保障项目不同,前者旨在保障因市场价格降低或产量减少同时发生进而导致生产者收入损失,可细分为附加收获价格期权条款和剔除收获价格期权条款;后者旨在保障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农场整体收入,且农场必须满足负债不超过 850 万美元的申请条件,实际操作中可根据农作物种植结构特征选择基本的联邦政府保费补贴或全农场保费补贴。整体而言,美国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的产品种类丰富,保险单元多样,补贴差异化特征明显(表 2),在稳定农民收入与主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2.3 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

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旨在由政府提供补贴、协助、援助,实现调整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态效益的长期目标。美国的生态补贴政策由来已久,主要通过阶段性立法和永久性立法促使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落地实施。1985 年美国为应对农业经济大萧条、改善美国耕地及生态环境,开始实施保护与储备计划,在该项目下自愿退耕的农场主可获取 10~15 年的经济补贴,若农场主参与退耕还林还可获取 50% 的绿化成本补贴。此后,美国在《2002 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中强化了对保护计划的支持力度,制定了保护安全计划、土壤保护储备计划、耕作土地计划、农地保护计划、环境质量激励计划小流域复原计划和其他保护计划。其中,实施效果最为显著的是环境质量激励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发放补偿性补贴和激励性补贴,帮助农民解决灌溉低效、土壤肥力不足、植物生长条件恶劣等问题,激励农民保护土地资源,从而实现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目前,美国已形成稳定有效的生态补偿制度体系。

欧盟的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始于麦克萨里(McSharry)改革方案,该项改革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保障农业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2003 年出台的交叉遵守制度、2005 年成立的农村发展基金、2008 年推出的健康检查制度、2013 年设定的“绿色”直接支付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欧盟农业绿色

发展支持政策的框架和内涵。其中,交叉遵守制度下的直接补贴与农业绿色发展密切相关、不与生产挂钩,要求农民必须遵守 18 项法律规定中的耕作一致性要求,并使耕地保持在良好的农业与环境状况下。绿色直接支付也具有强制性色彩,旨在提高农业环境绩效、实现环境和气候政策目标,具体分为规定作物多样性、永久绿地和生态重点区域等义务的标准绿色措施,以及必须符合成员国农村发展计划的对等绿色措施。在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实施过程中,欧盟不断强化生产者支持和一般服务支持,不断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灵活性,通过设定强制性的监督处罚机制来推动政策落实,绿色农业支持力度不断提高。2018 年欧盟提交的《关于未来食品和农业的立法建议》开启了农业绿色改革的新篇章,不仅强化了对交叉遵守制度的规定,还突出强调科技创新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在欧盟的 2021—2027 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前景中,进一步完善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增强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3 国外“绿箱”政策体系建设的异同点

整体来看,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丰富完善“绿箱”政策体系的过程中,侧重点有同有异。“绿箱”政策体系建设的相同之处在于:一是美国、日本、欧盟都支持“绿箱”补贴措施向消费者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倾斜,重视拓宽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支持政策手段;二是都主张渐进式改革模式,逐步调整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的比例,推进“绿箱”补贴体系不断完善;三是以增强政策的精准性和灵活性为改革重点,着力解决了不同地域发展模式、改革方向差异较大的问题,政策的传导机制简单顺畅,可操作性和指向性较强;四是重视提升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投入。

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绿箱”政策改革更加注重提升农业部门的长期竞争力、缓解国内财政危机、规避 WTO 规则约束,通过实施以直接收入支付和反周期支付为主的农业支持政策稳定农业生产,不断强化农业保险补贴在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中的地位,重点支持农业生产规模较大的农场主以致农业政策的公平性欠缺。而小农生产格局下日本以增强农业竞争力为改革导向,主张为农业提供高度保护,

积极推动“绿箱”支持政策转型,形成了以《农林水产地区活力创造计划》和《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为核心的政策体系,主要通过“降成本+抓品质+降售价”扩大利润空间,推动“六次产业化”以提升产业附加值,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与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协的社会化服务功能。欧盟的“绿箱”支持政策转型是在农业竞争力和绿色发展能力弱化的现实背景下,以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增强农业绿色发展能力为首要目标,以市场化、绿色化手段强化环境保护政策手段,重点支持农村地区环境保护支出,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创新推动,注重增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 中国“绿箱”政策体系初探

3.1 中国“绿箱”政策体系构成

当前,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归属“绿箱”的补贴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基于往期生产的脱钩补贴;二是—般服务与支持类政策;三是基于投入品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①。

基于往期生产的脱钩补贴,主要包括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补贴、农业结构调整类补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类补贴^[26]。为更好地适应WTO规则、进一步提高“绿箱支持量”在农业国内支持补贴中的份额,中国在2016年改革农业“三项补贴”,设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在不改变箱体属性的前提下将改革前的粮食直接补贴调整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补贴对象为承包权农户,同时以支持适度规模经营为施策目标,统筹农资综合补贴的20%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使粮食补贴开始向农业生产大户倾斜。此外,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培育高素质农民、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广基层农技4项内容。农业结构调整类农业支持政策通常包涵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发现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类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农业产业强镇、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程。

现阶段,中国—般服务与支持类农业政策主要包括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类、农业资源生态保护

和面源污染防治类、产粮(油)大县奖励与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其中,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类政策涵盖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机深松整地、土地确权登记等方面;农业资源生态保护和面源污染防治类政策涵盖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和保护性耕作、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重金属污染耕地综合治理等方面。针对生产者的农业绿色支持政策主要涉及退耕还林计划和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政策,实施力度均逐年增大。然而短期内国内耕地保护压力不减,农业面源污染严重,较大的资源环境约束压力迫切要求加快转变国内农业生产方式,进一步完善农业绿色补贴政策体系。

基于投入品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主要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07年以来中国逐步发展了以物化成本保险为主、辅以三大主粮作物大灾保险试点的农业保险补贴。国内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提供保费补贴,主要经历了初步发展期、快速拓展期、转型升级期和高质量发展期(表3)。近年来,中国不断增大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规模,2020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85.39亿元,为1.89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4.13万亿元,中央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果放大145倍^②;截至2018年,补贴品种范围也由最初的种植业5个,扩展至种植业、养殖业、林业3大类16个。由于传统成本保险和搭载保险覆盖成本有限,中国正在逐步扩大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投保农户发放保费补贴,支付比例高达70%~80%;新一轮改革将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都纳入了政策保障范围,能够有效防范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的双重风险。然而根据《农业协定》附件2第7条的相关规定,当前国内农业收入保险方案中保险对象、赔付条件、赔付金额等具体条款仍不满足认定要求,以致国内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还无法被认定为“绿箱”政策措施^[27]。

^①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 and 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财政强农惠农政策分类。

^② 资料来源: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jingshidian/jjrb/202107/t20210712_3734565.htm。

表 3 中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发展阶段

阶段	政策措施
初步发展期 (2007—2011 年)	2007 年在 6 省(自治区)实施水稻等 5 个种植业品种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 2007—2011 年, 补贴品种逐步扩大到 14 个大宗农产品, 包括天然橡胶、能繁母猪、公益林等, 种植业、养殖业、林业 3 大类 14 个大宗农产品; 补贴区域也逐步扩大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一些中央直属垦区
快速拓展期 (2012—2015 年)	2012 年起, 补贴力度不断加大, 直接物化成本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扩展到全国; 补贴作物范围扩大, 将糖料作物纳入补贴范围。2013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农业保险条例》
转型升级期 (2016—2018 年)	持续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把水稻、小麦、玉米的制种保险纳入补贴范围。补贴品种扩大到种植业、养殖业、林业 3 大类 16 个大宗农产品。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等一系列新保险品种的改革试点工作
高质量发展期 (2019 年至今)	出台《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9 年财政部在 10 个省(自治区)实施了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政策, 并于 2020 年扩大范围到 20 个省(自治区)

资料来源: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107/t20210707_3731907.htm。

3.2 当前“绿箱”政策存在的不足

3.2.1 “绿箱”补贴总量不足, 政策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宽

从补贴结构来看, 中国“绿箱”补贴总量不足, 占农业国内支持比重较低, 还有 4 项“绿箱”政策尚未启用。加之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放缓, 用于农业补贴和支持能力的财政支出增长较难, 而已实施的“绿箱”政策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不足, 大部分偏重政府一般服务支出, 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技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等补贴较少。此外, 中国在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基于生产者退休计划和投资援助计划的结构调整援助支出方面尚无施策经验, “绿箱”政策手段尚未用足, 短期性特征明显, 缺乏统筹考虑。

3.2.2 补贴面广且分散, 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有待加强

当前, 中国“绿箱”补贴政策未能精准聚焦, 相关法律表述缺少刚性条款, 内容不具体, 补贴的针对性不足; 再加之政策实施面广且分散, 整体执行效果不理想, 可持续性较差^[28]。例如, 农业保费保险补贴政策, 自实施以来国内农业保险不断扩面、增品、提标, 但由于直接物化成本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 农业大灾保险仅适用于适度规模经营农户, 近年来推行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尚不成熟、缺乏大规模推行经验。还需要在精准把握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发展方向基础上, 用好保费补贴存量, 切实发挥好农业保险的作用。

3.2.3 农业绿色发展支持保障不足, 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现行农业补贴政策过度强调增产, 较少关注农

产品质量提升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对绿色目标的实施保障不足, 对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补贴、秸秆还田、大型沼气池建设等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方式的补贴力度较弱。另外, 中国对生产者实施的绿色支持补贴政策更多以强制投入限制和无投入限制的支持为主, 自愿性投入限制的环境约束支持缺失, 尚未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农业支持模式; 政策实施缺乏有效监管和执行机制, 未形成对农业生产者的有效环境约束和激励机制。

4 优化中国“绿箱”政策体系的建议

美国、日本、欧盟的“绿箱”支持政策改革与演进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供了思路借鉴。当前, 中国“绿箱”补贴政策仍存在着补贴总量不足、政策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宽, 补贴面广且分散、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不强, 农业绿色发展支持保障不足、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问题。下一步应当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为施策目标, 充分利用可能的补贴空间, 着力完善结构合理、精准高效的“绿箱”补贴体系。

第一, 继续保持收入补贴的总体规模稳定。2016 年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整合为具有明确“绿箱”属性的收入补贴, 即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但国外收入补贴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表明, 定额的直接收入补贴往往存在财政负担较高、政策效果不强等问题。构建“绿箱”补贴政策体系, 要坚持发挥收入补贴的基础性作用, 但不宜持续提高定额收入补贴的规模。应当在继续稳定保持收入补

贴规模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的具体目标,提高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绩效,重视财政资金的运行效率和政策效果。

第二,合理设计收入保险的保费补贴机制。2020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815亿元,成为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各级财政共承担保费补贴603亿元,占全部保费收入的74%。各国的实践表明,对农业收入保险保费补贴的可操作空间比较大。中国收入保险的保费补贴还应当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关注WTO的规则动态,针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不符合《农业协定》的“绿箱”措施认定条件这一问题,及时对照相关条例规范调整补贴内容,按照中国农业发展实际状况合理设计、构建收入保险的保费补贴机制。优化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制度体系,增强对农业风险的保障水平。拓展一般服务支持的覆盖范围,给予保险公司补贴以降低保费水平,进一步释放WTO规则下“绿箱”补贴支持的操作空间。

第三,增强农业绿色发展支持的政策实效。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强化资源环境保护是完善农业支持政策的重要目标。中国应当全面践行“两山”理论,在保持现行“绿箱”补贴政策稳定的基础上,以促进农业农村绿色生态转型为目标,丰富与农业生态环境、食品安全挂钩的绿色支持补贴手段,以科技创新助推农业绿色发展能力的提高,不断提升“绿箱”补贴政策的前瞻性。

第四,深入参与全球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治理。构建完善“绿箱”补贴政策体系,不仅要在现行的国际制度框架下完善直接收入补贴、收入保险保费补贴、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等,加大对农技推广、社会化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还要深入参与全球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治理,争取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空间。积极参与WTO在农业支持保护、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规则调整与制定,提高政策节奏的引领性,塑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农业规则,增强补贴政策的获益公平性。

参考文献

[1] KRUGMAN P R, OBSTFELD M, MELITZ M J.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J]. Pearson, 2014, 41 (4): 281-282.
[2] BRANDER J, SPENCER B. Tacit collusion, free entry

and welfare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85, 33 (3): 277-294.
[3] 高鸣, 宋洪远, CARTER M. 补贴减少了粮食生产效率损失吗?: 基于动态资产贫困理论的分析 [J]. 管理世界, 2017 (9): 85-100.
[4] 许庆, 刘进, 杨青. WTO 规则下的农业补贴改革: 逻辑、效果与方向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9): 88-100.
[5] 程百川. 构建更有竞争力的农产品补贴体系: 从玉米产业说开去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 (1): 10-15+110.
[6] 冯海发. 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思路 and 措施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 (3): 8-10.
[7] 李俊松, 李俊高. 美日欧农业补贴制度历史嬗变与经验鉴镜: 基于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三阶段论” [J]. 农村经济, 2020 (4): 134-142.
[8] 林学贵. 美国、欧盟、日本的“绿箱”支持政策及其评价 [J]. 经济与管理, 2013, 27 (1): 56-63.
[9] 冯继康. 美国农业补贴政策: 历史演变与发展走势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3): 73-78+80.
[10] 孟昌, 赵旭. 中美农业补贴政策的若干比较与借鉴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 (2): 35-40.
[11] 齐皓天, 徐雪高, 朱满德, 等. 农业保险补贴如何规避 WTO 规则约束: 美国做法及启示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38 (7): 101-109+112.
[12] 刘超, 朱满德, 徐雪高. 美国农业国内支持与 WTO 规则一致性分析 [J]. 世界农业, 2017 (1): 4-12+239.
[13] 朴英爱, 付兰珺. 日本型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分析 [J]. 现代日本经济, 2021 (3): 59-67.
[14] 周建华, 贺正楚. 日本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及启示 [J]. 农村经济, 2005 (10): 123-126.
[15] 王鑫, 夏英. 日本农业收入保险: 政策背景、制度设计与镜鉴 [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 (3): 118-125.
[16] 娜仁图雅, 蓝志勇. 欧盟 CAP 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 [J]. 世界农业, 2017 (12): 37-41+57+259.
[17] 王军杰, 申莉萍. 论欧盟农业国内支持制度的演进及晚近发展趋势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7, 38 (2): 133-138.
[18] WESTCOTT P C, PRICE J M. Analysis of the US commodity loan program with marketing loan Provisions [R/OL]. (2001-04-01) [2021-07-06]. https://www.ers.usda.gov/webdocs/publications/41316/31884_aer801_002.pdf?v=41271.
[19] 王东辉, 张然, 田志宏. 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J]. 世界农业, 2015 (7): 83-86.
[2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deral crop insurance: program overview for the 115th congress [R/OL]. (2018-05-10) [2021-07-06].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193/4>.

- [21] 朱满德, 江东坡, 徐雪高. WTO 国内支持规则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调适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6): 104-109.
- [22] 马红坤, 毛世平. 日本和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的转型路径比较与启示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46-53.
- [23] 刘武兵.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研究 [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88): 108-109.
- [24] HİNGÖL U, AYHAN F. The impact of NEET and labor market indicators on human development: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EU-28 countries [J]. Sosyal Siyaset Konferansları Dergisi/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Conferences, 2020 (79): 441-468.
- [25] 魏加威, 杨沛华. 中美农作物收入保险产品: 比较与启示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 41 (4): 608-617.
- [26] 周静. 我国粮食补贴: 政策演进、体系构成及优化路径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0 (6): 89-93.
- [27] 朱晶, 徐亮, 王学君. WTO 框架下中国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的国际规则适应性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9): 2-20.
- [28] HUANG J, WANG X, ROZELLE S. The subsidization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China's agriculture [J]. Food Policy, 2013, 41: 124-132.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卫晋津)

(上接第 22 页)

- [27] RIHOUX D B, RAGIN C C.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9.
- [28] FISS P C. A set-theoretic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 (4): 1180-1198.
- [29] 池毛毛, 赵晶, 李延晖, 等. 企业平台二元性的实现构型研究: 一项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20 (3): 65-76.
- [30] 杜运周, 刘秋辰, 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 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 [J]. 管理世界, 2020, 36 (9): 141-155.
- [31]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 and beyo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32]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 [J]. 管理学报, 2019, 16 (9): 1312-1323.
- [33] 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Doing justice to logical remainders in QCA: moving beyond the standard analysis [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3, 66 (1): 211-220.
- [34] 张明, 陈伟宏, 蓝海林. 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 基于 94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4): 117-135.
- [35] RAGIN C C, FISS P C. Net effects analysis versus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a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J].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2008 (1): 110-212.
- [36] 赵宝春. 非伦理消费情景下感知风险对行为意愿的影响: 直接经验的调节作用 [J]. 管理评论, 2016, 28 (2): 116-126.
- [37] 马颖, 吴陈, 胡晶晶, 等. 基于 SD-SEM 模型的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信息搜寻行为 [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7, 37 (4): 962-971.
- [38] 贺小丹, 陈博, 杜雯翠.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者信心的冲击效果与作用机制: 基于中国 35 个城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分析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 42 (1): 40-50.
- [39] 肖丹, 任锦鸾. 如何有效控制负面口碑?: 以海底捞为例 [J]. 管理现代化, 2021, 41 (3): 83-86.
- [40] 林萌菲, 张德鹏, 薛东飞. 感知风险与利益对顾客忠诚的影响: 以银行理财顾客为例 [J]. 企业经济, 2017, 36 (5): 86-93.
- [41] 池毛毛, 王俊晶, 王伟军. 突发重大疫情下基层政府信任对公民信息不披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J]. 情报学报, 2021, 40 (6): 666-678.
- [42] 李宗伟, 张艳辉, 栾东庆. 哪些因素影响消费者的在线购买决策?: 顾客感知价值的驱动作用 [J]. 管理评论, 2017, 29 (8): 136-146.
- [43] 张宝生, 张庆普, 赵辰光. 电商直播模式下网络直播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消费者感知的中介作用 [J]. 中国流通经济, 2021, 35 (6): 52.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卫晋津)